

夏商周时期考古

赵丛苍

2019 年度的夏商周考古发现与研究，成果丰硕，是学术界和公众关注的焦点。山西绛县西吴壁、甘肃敦煌早峡玉矿、河南偃师商城、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族墓地等遗址的发掘，取得喜人收获。在手工业生产、墓葬、生业、都邑、封国、区域文化格局与交流互动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突出。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的相关简报和研究论文近 400 篇，报告、专著和图录 70 余部。召开了“第二届世界古都论坛暨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 6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第二届‘夏文化’国际研讨班”“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苏鲁豫皖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学术研讨会”“李学勤先生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等学术会议，景象繁荣。

一 夏商周考古综合研究

2019 年度公布了许多关于夏商周考古的新材料，涉及地域范围较广。

具体看来，河南、河北地区，《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 年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报告》（科学出版社）系统地展示了洛阳盆地中东部开展区域系统调查的考古成果。其中涉及了较丰富的三代时期遗存，展示了早期中国文明起源、国家产生的发展过程，为研究伊洛地区复杂社会的兴衰演变增添重要资料，具有重大学术价值。河南鹤壁辛村聚落遗址（《河南鹤壁辛村聚落遗址》，《大众考古》第 6 期），其主体遗存年代为西周至战国时期，是一处集手工业作坊、建筑基址、祭祀区于一体大型聚落遗址。《邯郸薛庄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报道了河北邯郸薛庄遗址的发掘资料。遗址以先商和晚商遗存为主，为进一步了解冀南地区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年代序列、文化面貌等提供了重要信息。

晋陕甘地区公布的新材料较多。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的考古成果是夏商考古的一项重大突破，为学者们高度关注。此遗址地处中条山北麓，发现丰富的二里头、二里岗时期的冶铜遗存。其与附近的壕沟、房址、窑址等遗迹，以及铜炼渣、残炉壁、矿石、鼓风嘴、坩埚等冶铜遗物，显示出较为完整的冶铜生产链（《山西绛县西吴壁遗址 2019 年春季考古再获新成果》，《中国文物报》2019 年 7 月 5 日）。这是学界首次在邻近夏商王朝腹心地区正式发掘的冶铜遗址，为深入探索夏商时期冶铜手工业技术和生产方式，以及夏商王朝对战略资源的控制等问题，提供了珍贵资料。《山西平陆虞国故城遗址调查简报》（《中原文物》第 6 期）报道了山西平陆虞国故城遗址由大城和小城组成，出土有龙山、两周和汉代的遗存。其中周文化遗存从西周中晚期延续至战国时期。《陕西旬邑县枣林河滩遗址商周时期遗存发掘简报》（《考古》第 10 期）显示，该遗址文化面貌与长武碾子坡遗址相



似,年代主要集中在殷墟三期至商末周初阶段,为研究区域文化格局及周文化形成过程等增添了新证据。甘肃宁县遇村遗址较丰富居址遗存的发现(《甘肃宁县遇村遗址2018年发掘收获》,《大众考古》第4期),以及在该县境内所开展的考古调查(《甘肃宁县石家墓地2018年考古调查》,《大众考古》第6期),连同石家墓地发掘的诸多收获,共同构成了近年陇东两周考古的亮点。其对于解构陇东地区先秦时期各文化之间的交流、变迁与融合,具有不可低估的学术价值。此外颇值得关注的有甘肃敦煌早峡玉矿遗址的考古收获。该玉矿遗址的功能区划分明显,分布具有规律,呈现出山体顶部设岗哨、中部开矿坑、底部建房址和选料区的组合特征(《甘肃敦煌早峡玉矿遗址考古调查报告》,《考古与文物》第4期),先后为早期四坝和齐家文化、骊马文化早期人群所经营。这是国内目前可确定的年代最早的玉矿遗址,对于古代采玉活动及其作业模式,以及中国古代“西玉东输”等问题的研究,有着宝贵的学术价值。

苏皖地区有较丰富的史前至两周时期考古材料的发布。江苏无锡梅里遗址发现大量商代晚期至春秋时期的遗迹与遗物,包含有马桥文化、湖熟文化和部分中原文化因素。这一类型的遗存在梅里古镇区域尚属首次发现,可能与“泰伯奔吴”的史实有关(《无锡公布梅里遗址考古重大发现》,《新华日报》2019年7月24日)。江苏沭阳吕台遗址所发现的两周时期遗存,显示出宗周文化和南方吴越文化的因素,可能为徐淮夷方国文化研究提供有价值的资料(《江苏沭阳吕台遗址考古勘探和试掘简报》,《东南文化》第5期)。《句容浮山果园土墩墓群发掘报告》、《句容寨花头土墩墓群发掘报告》和《金坛薛埠土墩墓群发掘报告》三部报告(文物出版社),对2005年在江苏省金坛市、句容市发掘的商周时期土墩墓资料作了全面公布,为土墩墓形制结构、分期分区等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依据。安徽阜南迎水寺遗址发现了灰坑、房址、铸铜和制骨手工业作坊等遗迹,遗址功能区划分较明确、清晰。年代为龙山晚期、商代和西周时期。其中夏商之际的遗存是淮河流域北部地区的首次发现(《安徽阜南迎水寺遗址发现龙山到西周遗存》,《中国文物报》2019年11月29日)。《姑溪河—石臼湖流域先秦时期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科学出版社)公布多处马家浜文化时期至两周时期遗址,有助于从长时段的视角对长江中下游地区先秦时期社会变迁进行深入研究。

浙闽地区三代时期的考古发现可谓不甚丰富。浙江宁波奉化方桥何家遗址发现少量商周时期遗存(《浙江宁波奉化方桥何家遗址2017年发掘简报》,《南方文物》第1期)。福建荆溪芝山遗址出土西周至春秋时期的房址与灰沟,并有陶器、原始瓷、石器和建筑构件等遗物(《福州市荆溪芝山遗址2015年试掘简报》,《福建文博》第4期)。福建博物院和浦城县博物馆公布了浦城县猫耳山聚落遗址考古调查勘探材料,其中涉及青铜时代早期的遗存(《浦城县猫耳山聚落遗址考古调查勘探报告》,《福建文博》第1期)。江西金溪石岭山遗址考古调查发现西周至春秋时期的遗存。遗存以陶鼎足、小方格纹硬陶器为代表(《江西省金溪县石岭山遗址考古调查简报》,《南方文物》第6期)。曾丽和严振洪对江西抚河中游先秦考古学文化发展脉络和年代序列进行分析。依据调查和发掘的新资料,他们认为此地区主体遗存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夏至早商时期、晚商至西周早期、西周中晚期至春秋早期,分别属于樊城堆文化、江西夏时期文化、万年类型晚期阶段、神墩—磨盘墩类型(《江西抚河中游先秦考古学文化面貌与年代初步认识》,《南方文物》第6期)。郑建明对新世纪前十年浙江先秦时期考古工作进行回顾,主要关注越文化考古,包括大型聚落遗址,大型城址,早期土墩墓,手工业的发现、发掘与研究等几个方面,是对浙江先秦时

期考古工作较系统的归纳梳理（《新世纪头十年浙江先秦时期考古的新进展》，《古代文明》第13卷）。

在内蒙古地区，准格尔旗石口子遗址发掘出朱开沟文化晚期的灰坑和房址，以及东周时期的墓葬，出土陶、石、铜、铁、骨器等遗物（《内蒙古自治区准格尔旗石口子遗址发掘简报》，《文物春秋》第1期）。乌拉特后旗布尔汗山遗址和达拉盖沟遗址调查发现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的墓葬、居址和岩画等遗迹，确定亚腰形石板墓为青铜时代晚期遗存，可能属特布希文化（《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布尔汗山遗址和达拉盖沟遗址调查报告》，《西部考古》第17辑）。

其他地区也有一些三代时期的遗存见于报道。湖南羊舞岭遗址发现了石家河文化晚期到早期商文化阶段的遗存，对完善资江中下游地区的年代谱系和探讨二里头文化在这一地区的传播具有宝贵价值（《湖南益阳羊舞岭遗址考古发掘报告（B、C区）》，《湖南考古辑刊》第14集）。云南晋宁河泊所和西王庙遗址商周时期石寨山文化居址的发现，为全面认识该文化的内涵提供了新线索（《云南晋宁河泊所和西王庙青铜时代贝丘遗址试掘简报》，《江汉考古》第2期）。辽宁沈阳北崮青铜时代遗址和辽宁大学百鸟公园遗址发现了新乐上层文化遗存（《沈阳北崮青铜时代遗址2016年调查与试掘简报》《沈阳辽宁大学百鸟公园遗址2005年考古发掘简报》，《沈阳考古文集》第7集）。新疆温泉呼斯塔遗址1处大型居址组合和4座属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墓葬，为研究该地区乃至亚欧草原地区青铜文化的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组织结构提供了值得重视的资料（《新疆温泉呼斯塔遗址2017—2018年发掘收获》，《中国文物报》2019年3月9日）。《新疆洋海墓地》（文物出版社）、《通化万发拨子遗址考古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重庆三峡后续工作考古报告集（第一辑）》（科学出版社）和天津蓟州塘坊遗址（《天津蓟州塘坊遗址考古发现夏商等不同时期遗存50余处》，《光明日报》2019年6月22日），对三代时期的遗存也有相关报道。

2019年度有多部三代考古综合研究的专著和论文集出版。李学勤《中华古代文明的起源：李学勤说先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选有34篇作者既往发表的论著。此书站位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的整体视角，内容涵盖甲骨文、青铜器、简牍、帛书、封国文化等，并对虞夏商周研究，甲骨学、青铜器分期研究诸学术命题进行导引展望，甚具启发性。《林沅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有考古学、文字、古史三卷，收录作者已发表的研究文章，集中反映了其在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可谓对三代考古的有益贡献。秦小丽《中国初期国家形成的考古学研究：陶器研究的新视角》（复旦大学出版社），以陶器风格将二里头、二里岗文化分区，并结合数量分析的方法，尝试以新的视角即陶器风格的时空变化，来阐释国家形成期地域间的关系，为早期国家形成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南方先秦考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收录了中国南方先秦考古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共21篇。主要讨论印纹陶、原始瓷、玉石兵器、铜器等文化类型品的发展与演变，并涉及了吴越文化，古舒国的文化传播、变迁等议题，是对南方先秦考古成果的一个系统展示。杨建军《岭南地区商周时期墓葬研究》（科学出版社）一书，对岭南地区商周墓葬的分期及其文化面貌等，作了较深入研究。方勤《曾国历史与文化——从“左右文武”到“左右楚王”》（上海古籍出版社），依据近年新发现考古资料以及出土文献，结合传世文献，对曾国历史进行了梳理，是近期关于曾国研究的一部集结性成果。宋亦箫《青铜时代的東西文化交流：以新疆东部为中心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结合考古学、人类学、语言学和文献学资料，对新疆东部青铜时代的文化谱系、新疆东部及相关地区的早期东西文化交流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刘丽《两周时期诸侯国婚姻关系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通过传世文献与出土材料，分析了两周时期主要诸侯国的婚姻关系，对于探究两周时期政治形势变化发展及其社会转型以及社会结构方面的变化具有重要价值。

专题研究论文方面，许宏以东北地区为例讨论了“青铜时代”概念的时空适用性（《论“青铜时代”概念的时空适用性——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例》，《聚才揽粹著新篇——孟凡人先生八秩华诞颂寿文集》，科学出版社）；谢肃对三代聚落进行了简要阐述（《三代聚落述略》，《三代考古（八）》）。

2019年8月25~26日，“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会议以“夏商时期聚落与环境”为主题，通过对盘龙城及其他相关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的梳理，探讨了夏商时期中原与长江流域的联系、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等问题（《盘龙城与长江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召开》，《中国文物报》2019年8月27日）。8月30—31日，“苏鲁豫皖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滕州召开。内容主要涉及苏鲁豫皖四省区域近年来商周时期考古新发现、徐淮地区商周时期文化交流、苏鲁豫皖地区区域文化因素分析及商周时期相关专题研究，包括青铜器及铭文、陶礼器、盐业、手工业和科技考古等（《聚焦徐淮区域，再掀研究热潮——“苏鲁豫皖地区商周时期考古学文化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文物报》2020年1月3日）。由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和国学院、日本东北大学文学研究科和亚细亚流域文化研究所、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扣岑考古研究所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的“楚文化与长江中游早期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围绕楚文化考古研究、楚地出土资料研究、楚国历史地理与长江中游早期开发等三个方面展开研讨，成果颇丰（《“楚文化与长江中游早期开发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江汉考古》第2期）。

2019年12月7~8日，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主办“李学勤先生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百余位专家学者深入总结李学勤先生的学术成就与学术思想，探讨古文字、古文献、古史、考古学等与中国古代文明息息相关的学术问题（《江汉考古》第6期）。此外，《国际汉学》（第2期）、《文物天地》（第4期）、《中国史研究动态》（第5期）等杂志均邀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撰文，追述李学勤先生对曾国考古、湖北文物考古的贡献，畅叙先生的治学特点，回忆与先生的亲切交往，表达对先生的怀念。

二 夏代

2019年，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开馆，“第二届世界古都论坛暨纪念二里头遗址科学发掘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安徽肥西三官庙遗址发掘等，掀起了夏文化研究的新热潮。

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研究的重点，所涉及成果十分集中。

在考古材料方面，南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介绍了王营遗址二里头文化三期水井遗存的材料。因为发现水井中包含有陶捏沿罐、尊、擂钵等器物，发掘者推定这些水井为生活水井。此发现丰富了南阳盆地夏文化的内涵（《河南南阳市王营二里头文化水井发掘》，《华夏考古》第3期）。山西灵石县逍遥遗址发现了较丰富的二里头文化早期遗存，为认识晋南至晋中灵石口地区考古学文化提供了值得珍视的资料（《山西灵石县逍遥遗址发掘简

报》，《考古》第1期）。

2019年度正值二里头遗址考古发掘60周年，学界十分重视对二里头六十年考古发掘、研究历程的回顾总结，以及对夏文化研究的理论思考。

许宏、袁靖《二里头考古六十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对二里头遗址的田野考古历程、年代、聚落形态、生产生活、社会文化、保护利用等各方面进行了系统的阐述。赵海涛、许宏等《二里头遗址发现60年的回顾、反思与展望》，对二里头遗址发现60年以来所做的考古发掘、研究、遗产保护、展示利用等工作进行了回顾、反思及展望（《中原文物》第4期）。许宏、贺俊《二里头：从田野到阐释》，对二里头遗址发现与研究60年来所采用的发掘理念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认为其经历了从物质的分期和文化谱系的研究到聚落形态、经济贸易、社会结构、文明进程等社会形态研究的过程（《二里头：从田野到阐释》，《南方文物》第2期）。贺俊的《二里头文化古史属性研究的新动态及相关问题》，回顾了二里头文化性质从“二里头西亳说”到“二里头全为或主体夏都说”的讨论始末。对二里头文化的讨论还反映在其年代、考古学文化、族属等问题上（《二里头文化古史属性研究的新动态及相关问题》，《南方文物》第2期）。

朱凤瀚通过回顾夏文化探索的历程，提出研究中需要注意的问题，他认为与研究目标相关的有可信度的文献仍应重视，而这离不开严谨、审慎的考证工作。同样，对于发掘材料，需要按照考古学的理论与规范进行实事求是的阐释。与夏文化相关的重要学术问题的解决可能有待于二里头文化的高规格墓葬等遗存的发现与发掘（《夏文化考古学探索六十年的启示》，《历史研究》第1期）。郭伟民认为必须先做好精细、客观的考古学文化类型的划分，然后在此基础上做社会的研究。而材料的扩充度和可信度决定了考古学文化及相关族群、王朝或者国家的对应程度（《夏文化：传说与史实中的考古学角色》，《遗产》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他由夏文化论争引发对考古学边界问题的思考，认为考古学的边界也是当代认知的边界，考古学构建的历史并非一定要与文献对应，因为这不是考古学的本质和目的（《目标与定位：关于考古学边界问题》，《中国文物报》2019年7月5日）。徐良高从文化理论视野展开分析，反思以往常见的考古学文化与国家或族群的直接对应方式。他认为不可以简单地将某些考古学文化和文献中的特定国家政治体或民族认同体，视为相互间具有完全的、实质性的对应关系（《文化理论视野下的考古学文化及其阐释（上）》，《南方文物》第2期；《文化理论视野下的考古学文化及其阐释（下）》，《南方文物》第3期）。董琦则强调了发现夏代文字材料在夏代信史确证过程中的重要性（《夏文化探索与夏代信史说》，《南方文物》第2期）。许宏等通过“有条件的不可知论”，主张应淡化对考古学遗存背后早期人群的族属或王朝归属这类并非学科所擅长的议题的研究，要更多地转向以聚落考古为基础的包括对聚落形态、人地关系、社会结构、技术经济、生计贸易等方面的研究（《二里头：从田野到阐释》，《南方文物》第2期；《考古学参与传说时代古史探索的论理》，《遗产》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对早期夏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砦文化的讨论方面。魏继印《论新砦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关系》，认为新砦文化早于二里头文化一期，是一支独立的考古学文化，与其他区域晚期阶段的王湾三期文化并存（《论新砦文化与王湾三期文化的关系》，《考古学报》第3期）。李维明提出花边罐可被当作区分二里头文化与“新砦二期”的标型器之一，出土花边罐的新砦期遗存应属二里头文化。他据此对原本出土有花边罐被定为“新砦期”的遗存进行了重新认识（《新砦遗址新砦期花边罐及其启示》，《中国文物报》



2019年5月5日)。

聚落形态视角是关于二里头都邑研究较集中的表现,陈国梁从聚落考古的角度讨论二里头文化的兴衰,认为二里头都邑的出现受到龙山文化晚期至二里头文化早期洛阳盆地与周边区域社会重构的影响,而二里岗文化的进入以及核心聚落的转移致使其原有聚落崩塌,社会重组(《合与分:聚落考古视角下二里头都邑的兴衰解析》,《中原文物》第4期)。二里头祭祀遗存的识别具有特殊的学术意义,杜金鹏将殷商卜辞、古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相结合,识别出“坛”“墀”类祭祀遗存。他认为二里头遗址圆坛可能是祭祀天神的“天坛”,长方形墀则可能是祭祀地祇的“地坛”(《偃师二里头遗址祭祀遗存的发现与研究》,《中原文物》第4期)。赵春燕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对锶同位素的分析来追溯古代人类迁徙活动,其中涉及对二里头遗址古人类的迁徙情况研究,得出其迁徙居民约占总人口的30%,此亦符合都邑性遗址人口的迁徙情况(《锶同位素分析技术追踪古人类迁移活动的研究》,《北方文物》第3期)。陈雪飞通过对河南郟城皇寓遗址出土的二里头文化的陶器的微痕观察以研究其制陶工艺。经分析认为漯河—驻马店地区的杨庄类型应属于二里头类型(《河南郟城皇寓遗址二里头文化陶器工艺及特征分析》,《中原文物》第6期)。梁宏刚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冶金遗物的分析测试,认为二里头遗址铸铜作坊可以熔铜,还可能存在冶炼铜的过程,表明二里头遗址具备本土生产铜器的能力(《二里头遗址出土冶铸遗物中的一些特殊现象的思考》,《南方文物》第5期)。邓玲玲梳理二里头文化区内发现的铜铃及陶铃,认为使用铃的二里头高等级贵族不仅具备政治和军事职能,在以高等级手工业为核心的经济职能上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二里头文化铃的性质刍议》,《中原文物》第4期)。李维明强调密县黄寨二里头文化牛骨刻辞发现的重要性。他认为甲骨文出现的时代应由商文化时期前推至二里头文化(《黄寨二里头文化牛骨刻辞发现与研究》,《中国文物报》2019年10月11日)。

此外,在夏及夏文化研究热潮的推动下,对“最早的中国”之时段及地域的确认等问题,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

孙庆伟对于追溯“最早的中国”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何为“最早的中国”提出见解。他强调此类问题必须回归政治和文化层面,并围绕中原华夏文明来探讨,而黄帝及其部族的诞生属“中国”观念的最初阶段,是“最早的中国”(《“最早的中国”新解》,《中原文物》第5期)。张国硕则根据“中国”的五种主要涵义对“最早的中国”作出解读,认为“最早的中国”需要具备位于黄河流域、进入早期国家、文化地位占优三项基本条件,并提出从地域、都城、族群文明、国家、考古学文化这五种意义上,“最早的中国”应分别指西周初期的伊洛地区、西周王朝的都邑、春秋早中期之交的华夏诸侯分布区、西汉帝国、陶寺文化之邦国(《也谈“最早的中国”》,《中原文物》第5期)。韩建业分析了文化意义上的最早中国。认为最早的中国形成于公元前4000年左右的庙底沟时代,具备多元一体结构,是早期东方文化圈的主体部分。而以农为本和祖先崇拜分别是其最本质的和最核心的观念(《最早中国:多元一体早期中国的形成》,《中原文物》第5期)。杜金鹏为学界有关“最早中国”的讨论增添不同的看法。他从传统史观与“中国”概念、“最早中国”的形成、“中国要素”、“尚中”哲学观、唯一“最早中国”这五个方面展开论述,强调以二里头夏都为代表的“最早中国”具有唯一性,“最早中国”具有排他性(《“最早中国”之我见》,《南方文物》第6期)。陈淳探讨了研究夏朝与最早中国的方法论。他认为考古学擅长探索史前文明长时段的兴衰,而用考古学方法所提炼的信息与文献

证据结合对于历史重建十分重要（《科学地探寻夏朝与最早中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6月10日）。

夏时期周边区域的考古发现，主要集中于江淮地区、西北地区、鲁中地区，它们的发现有助于推动不同区域文化互动交流研究的深入。

安徽肥西三官庙遗址的发掘备受关注，成为本年度夏商考古的一大亮点。发现了主体年代为二里头四期的遗存，并出土大量青铜器，是目前除二里头遗址之外发现这一时期铜器最多的地点。而这批铜器的种类、形制、埋藏环境等特征鲜明，可能有力推动对江淮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互动的探讨，也为二里头时期冶金考古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安徽肥西三官庙遗址发现二里头时期遗存》，《中国文物报》2019年8月23日）。安徽大学和铜陵市博物馆2016年对铜陵古铜矿冶遗址的调查，在师姑墩遗址发现了可早至二里头时期的矿冶遗物，表明该地区在二里头时期已存在铜矿的采冶活动，有助于推动中国古代冶金技术的起源与发展的深入研究（《安徽铜陵古铜矿冶遗址2016年调查及若干收获》，《南方文物》第2期）。

西北地区早期青铜时代的研究重点主要为齐家文化、四坝文化。2015年喇家遗址公园排水管道建设区域发现了较丰富的齐家文化遗存，并发掘出有当时人为修整和利用痕迹的壕沟，增加了对聚落布局的原有认知（《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公园排水管道建设区域2015年度发掘简报》，《四川文物》第4期）。2017年对青海民和喇家遗址的发掘，证明了喇家遗址VIII区存在因灾难而废弃的齐家文化遗存（《青海民和喇家遗址2017年的发掘与认识》，《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科学出版社）。朱延平通过分析齐家文化的玉璧，发现其与黄河上游土著文化陶纺轮或圆陶片存在一定的关联，其中两分色玉璧中隐现牛毛沁等沁斑的玉质可能是出于对绳纹的模拟（《试论齐家文化玉璧之源》，《文博》第3期）。韩建业探讨了齐家文化与中原文化的关系。认为齐家文化晚期与中原地区文化存在密切交流，又间接受到西方文化的显著影响，但强调不能认为齐家文化属于早期夏文化（《齐家文化的发展演变：文化互动与欧亚背景》，《文物》第7期）。庞小霞、王丽铃《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交流探析》，探讨二里头文化与齐家文化的交流路线、相关媒介及产物，认为齐家文化为二里头文化给予了技术输出，而二里头文化为齐家文化输出了绿松石铜牌饰、壶形盃、牙璋等礼仪用具（《齐家文化与二里头文化交流探析》，《中原文物》第4期）。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发现了属于四坝文化的长方形竖穴偏洞室墓。发掘区的西部还发现骊马文化的灰坑打破四坝文化的墓葬，这从地层上解决了两者的早晚关系问题（《甘肃玉门火烧沟遗址2005年发掘简报》，《文物》第3期）。

山东岳石文化研究也有新进展。山东济南章丘城子崖遗址复掘，证实城子崖遗址有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周代三个时期的城墙（《济南市章丘区城子崖遗址2013-2015年发掘简报》，《考古》第4期）。城子崖岳石晚期城址发现了目前最早的“一门三道”城门结构，可能具有一定的政治礼仪功能（《山东章丘城子崖岳石晚期城址发现“一门三道”结构》，《中国文物报》2019年12月6日）。

有关岳石文化年代学研究，龙腾文等人对岳石文化年代提出不同看法，利用已有质量合格的 ^{14}C 测年数据进行贝叶斯年代建模分析，发现岳石文化的模型年代比原来提出的年代要早（《海岱地区史前遗址 ^{14}C 测年数据的贝叶斯分析——审视考古年代学》，《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饶宗岳等人同样强调了贝叶斯方法在年代学中的重要作用，但不赞同上文中龙腾文等人对文化间相对年代关系的部分假设，并结合地层学和器物类型



予以解释和反驳（《海岱地区年代学新成果的思考与启示》，《东方考古》第15集，科学出版社）。

生业方面，郭荣臻、靳桂云运用统计学方法，发现岳石文化出土农作物主要有粟、黍、稻、小麦、大麦、大豆6种，其中以粟类谷物为粮食主体（《岳石文化农业经济的植物考古新证》，《东南文化》第1期）；王振祥、葛利花分析了岳石文化各区域在农业种植和动植物资源利用上的差异与特点（《岳石文化区域环境与生业经济的差异化研究》，《文物春秋》第6期）。

陕西二里头时期文化遗存也被受到关注。李永强、王继红对陕西东部二里头时期各遗址进行分期研究，并对典型陶器的演化规律进行总结。此为陕西东部二里头时期的年代序列的建立、文化面貌及其与周边地区关系的揭示作了有意义的探讨（《陕西东部地区二里头时期遗存分期研究》，《文博》第6期）。

常怀颖从公元前2000年前后晋陕高原至燕山南麓广大区域内过渡期遗存特征分析展开讨论。进而提出该时期在面对中原腹地的整合变革时，北方出现的各类新考古学文化具有相互密切交流但仍各自相对独立的特性（《中原腹地以北地区的“过渡期”遗存蠡探》，《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

2019年度关于先商文化方面的研究并不多。陈畅主要论述了鹤壁刘庄墓地的分期与年代，认为刘庄墓地一期至三期的年代大体和白燕四期文化、下七垣文化相当，其中刘庄墓地二期至三期与东下冯文化二期至三期年代相当，刘庄墓地二期与二里头文化二期年代相当（《鹤壁刘庄墓地分期与年代研究》，《华夏考古》第3期）。关于商人起源地，张渭莲将其范围大致锁定于太行山至泰山之间的古黄河下游区域（《商先公踪迹与商人起源考》，《历史研究》第2期）。同时，张渭莲还提出应注重考古资料与文献资料的结合、加强考古发现与研究理论的建构以促进商族起源的探索（《商族探源在争论中走向第三次突破》，《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7月30日）。

有关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研究，在本年度也相对较为沉寂。余肖肖和包曙光分析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址的分类与分区，并从建筑技术角度探讨夏家店下层文化与其他文化的互动关系，认为其吸取了小河沿文化和后岗二期文化的建筑技术，也与大坨头文化、岳石文化和高台山文化存在交流（《夏家店下层文化房址初探》，《北方民族考古》第8辑，科学出版社）。

三 商代

2019年度所公布的有关商代考古的材料，主要集中在河南和山西等地。湖北和青海地区也有一些报道。

商王朝中心区域的商代前期遗存，偃师商城宫城东南部新发现一处祭祀地点，埋藏有百余具较为完整的猪骨，为研究宫城布局提供了一定启示（《河南偃师市偃师商城宫城祭祀D区发掘简报》，《考古》第11期）。偃师商城遗址小城的西北部发现8列23座排列有序的较大体量的圆形建筑基址。这是偃师商城首次发现圆形建筑，其形制、规模和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基本一致。发掘者推测此很有可能是商代囤仓遗址。这填补了偃师商城小城西北部区域遗迹的空白，为深入了解二里岗文化在豫西地区确立的过程和偃师商城性质的探讨增添了证据。（《河南偃师商城囤仓遗址》，《大众考古》第12期）。所公布的郑州

小双桥遗址中心区域外围的部分材料显示,商文化遗存以白家庄期为主,发现“舌”字陶文。“舌”地应为仲丁迁敖(器)之所在(《郑州小双桥遗址2014年IVA02区发掘简报》,《华夏考古》第5期)。洹北商城时期的铸铜与制骨作坊被确认,区域内还发现有与作坊大体同时的布局有序的铸铜工匠墓地(《洹北商城作坊区内发现铸铜工匠墓》,《中国文物报》2019年6月21日)。商后期主要为安阳殷墟的考古材料。2015~2016年安阳殷墟大司空村东南地发现了大量的灰坑、窖穴、水井和墓葬等,还发现了七片刻有非王卜辞的卜甲(《安阳殷墟大司空村东南地2015~2016年发掘简报》,《考古学报》第4期)。《考古》第3期公布了2011~2014年在安阳殷墟豫北纱厂发掘的殷墟一期晚段至殷墟四期的考古资料,比较重要的是制骨、制陶手工业遗存(《河南安阳市殷墟豫北纱厂地点2011~2014年发掘简报》,《考古》第3期)。安阳辛店发现一处商代晚期大型族邑聚落和青铜铸造遗址,包括墓葬、房基、道路、灰坑、窖穴、水井、烧土面、窑炉、熔炉遗址等遗迹和铜器、陶范、炉壁等与铸铜有关的遗物,墓葬中出土带有“戈”字铭文的青铜器20余件。此遗址为“大殷墟”范围内的聚落布局以及“殷遗民”迁徙的研究增添了新资料(《考古发现证实河南安阳辛店遗址为商代晚期大型青铜铸造基地》,《光明日报》2019年2月27日;《安阳辛店铸铜遗址的年代、性质和布局探讨》,《南方文物》第5期)。

围绕郑州商城、偃师商城、洹北商城、垣曲商城、安阳殷墟而展开商王朝中心区文化的研究,内容较丰富,涉及范围较广。

对于偃师商城的研究,主要集中于遗存年代、聚落形态、遗物的象征意义分析诸方面。就偃师商城宫城第三号宫殿建筑基址的年代问题,谷飞回顾了学界已有的相关研究,坚持三号宫殿建筑的建造和使用年代应当与五号宫殿的年代大致相同(《偃师商城宫城第三号宫殿建筑基址的年代问题》,《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美]卡炊卡·雷哈特探讨了偃师商城遗址的仪式宴飨问题,通过对出土陶器类型、尺寸的分析认为偃师商城存在包括大规模的排他性宴飨、小规模宴飨和象征性宴飨多种不同类型的宴飨仪式;通过宴飨反映偃师商城的社会政治结构不是严格等级制(孙瀚龙译,陈星灿校:《偃师商城的仪式宴飨与权力获得(三)》,《南方文物》第1期;《偃师商城的仪式宴飨与权力获得(四)》,《南方文物》第6期)。谷飞、陈国梁从社会考古的视角对偃师商城及其所处区域同时期聚落和墓葬的分析,指出该城址一直是区域性的中心聚落(《社会考古视角下的偃师商城——以聚落形态和墓葬分析为中心》,《中原文物》第5期)。

对垣曲商城的研究,胡子尧、井中伟认为垣曲商城夹墙的设置作为铜料运输通道的功能,进而得出在商代早期可能存在着一条以垣曲商城为重要中转站,通过黄河水路将中条山铜矿资源运送到王都地区的北方铜料运输路线(《垣曲商城夹墙设施功能探析》,《考古与文物》第4期)。侯卫东认为洹北商城营建的历史文化背景与商人祖先崇拜有一定联系。其政治背景是商人在郑州商城逐渐失去了凝聚力和控力,可能与“河亶甲居相”有关(《试析洹北商城的形成背景》,《华夏考古》第4期)。

安阳殷墟的研究,以学术史、类型分析、遗存性质、手工业布局等角度而展开。《安阳发掘简史》(“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一书以石璋如先生的遗稿为基础编辑而成,主要是对历次安阳发掘的情况进行概括叙述。汤毓赞从墓葬形式、器物的风格、铭文、工艺分析入手,探讨殷墟墓葬青铜容器的来源及其与墓主生前的社会关系之联系(《试论殷墟墓葬青铜容器的来源“构成”》,《考古》第5期)。常怀颖在对殷墟车马器所作研究中指出,殷墟遗址所见的马衔、马额饰、轭首、兽形铜扣和带环铜箍是在殷墟时期



新出现的器物。这体现了该时期车马系驾技术的发展，也反映了人们在意识形态上对于车马使用的认知与态度（《殷墟车马器补议》，《江汉考古》第5期）。陈翔对殷墟骨镞的类型、功能与象征意义进行探析（《殷墟骨镞形制与功能研究》，《文物》第9期）。王祁从性别考古的角度，提出兵器、手工工具、纺织工具、铜铃和弓形器可以作为殷墟墓葬中两性身份的标识物，并对商王朝晚期女性角色做了分析探讨（《殷墟墓葬两性社会角色的考古学研究》，《江汉考古》第1期）。刘一曼分析了十一条非王卜辞以及殷墟的两处族宗庙遗存，指出殷代殷王和各族都有宗庙以祭祀本族祖先。其中小屯 F29 可能是与王有密切关系的某一子族的宗庙，大司空村 C 区建筑群中的 F22 可能是马危族的宗庙（《殷墟商代族宗庙的发现与研究》，《考古与文物》第6期）。王祁就商人服象与象之分布提出新看法，认为商人曾在殷墟驯养大象，商末殷墟附近几无大象踪迹。商末山东地区存在商人驯养的大象，而商人驯象的主要目的是为其提供艺术品原材料和祭祀用品（《商人服象与象之分布》，《东方考古》第16集，科学出版社）。何毓灵分析殷墟手工业时空布局及其之间的关系，认为手工业生产至少有家族经营和王室经营两种模式，其布局是对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时期布局的继承，并强调了其对西周王朝的重大影响（《论殷墟手工业布局及其源流》，《考古》第6期）。

《南方文物》集中发表了数篇有关安阳殷墟的研究成果。牛世山、岳洪彬和岳占伟以陶器为例分析殷墟文化的多元因素（《殷墟文化的多元因素再分析——以陶鬲为例》，《南方文物》第5期）。他们将陶鬲分为三大类、38型，按文化风格细分为17组以上，认为殷墟文化出现许多非典型风格陶器群组，其主要器类陶鬲应是人们从各地来到殷都旅途中和居地的炊具。殷墟晚商墓随葬的牲腿以往缺乏一定的动物考古鉴定和分析，李志鹏对其研究发现，晚商随葬的牲腿来自当时常见的家养动物，种类有猪、牛、羊、狗、马、鸡等，以前三者数量居多。所殉动物以幼年个体为主，牲腿崇尚使用左侧前腿（《殷墟晚商墓随葬牲腿现象的相关问题再探讨》，《南方文物》第5期）。丘山代结合文献和考古发掘资料推断，殷人不会盗掘殷人墓葬。从文献看，商人有敬事鬼神的传统礼制和尊崇祖先的道德规范。此外，商时期常见晚期遗存有意避让早期遗存的现象。因此商代至西周中期以前，基本不见为逐利而盗墓毁墓的情况（《殷人不会盗掘殷人墓葬的证据》，《南方文物》第5期）。于浩基于殷墟南区的新发现对其文化内涵、时代、布局等进行讨论。殷墟南区的主体年代从殷墟二期延续至殷墟四期晚段。其聚落分布是以片状分布为主体，有较明显的区域性、功能性划分，反映了殷都内低密度城市化布局的实况。而墓葬出土铭文种类多，可能反映了多个氏族杂居的情况（《殷墟南区考古新发现和布局探索》，《南方文物》第5期）。日本学者黄川田修以都城圈的概念解释“大殷墟”的含义（《试论大殷墟》，《南方文物》第5期），他认为大殷墟是以安阳老城区为中心，东西约38千米，南北至少有18千米的巨大遗址群。在此范围内，小屯殷墟可能不是唯一的核地区，而位于畿内圈东境的内黄县一带或会发现晚商的另外一处都城遗址。此外，古运河和大殷墟遗存的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还有研究者分析了大邑商聚落模式对现代城市建设的启示。杜光华认为殷墟“葡萄状”的族邑模式、商代水陆交通网、水城共融的环境、手工业作坊布局、宫殿建筑格局、军事防御制度等对现代城市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商王都大邑商的聚落模式对现代城市建设的启示》，《南方文物》第5期）。这些为殷墟考古研究提供了比较新颖的方向性探索。

殷商文化外围地区，考古工作基本集中在晋陕、湖北和青海地区。晋陕地区得以公布

的李家崖文化相关遗存较多。山西柳林高红遗存被认为是李家崖文化的一个地方类型，主要发现有夯土建筑、灰坑、灶址、墓葬等，年代为殷墟二期至殷墟四期（《山西柳林高红遗址2007年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6期）。陕西榆林柳树崾梁遗存的文化面貌与李家崖文化相关，还受到了内蒙古西岔文化、关中商文化的影响。其主体年代应为殷墟三期或略晚，下限可能到了商周之际（《陕西府谷柳树崾梁遗址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6期）。曹大志报告了山西省石楼县20处李家崖文化遗址的考古调查情况和采集植物遗存的浮选结果。他发现这些遗址最显著的特点是规模小而分散，生计方式为粗放农业、定居程度较高（《李家崖文化遗址的调查及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7期）。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是南方地区商时期考古工作的重点。盘龙城小嘴2015~2017年的发掘，发现在二里岗上层文化一期及稍晚的灰沟，出土有与铸铜相关的遗物，为确证盘龙城遗址在二里岗文化时期存在青铜器铸造活动提供了有力物证（《武汉市盘龙城遗址小嘴2015—2017年发掘简报》，《考古》第6期）。《东方考古》第16集公布了河北柏乡县赵村遗址2015年发掘简报，发现大量商代中期到晚期的遗存，包括灰坑、灰沟、祭祀坑、陶器等，是邢台地区少数进行了系统的动物考古和植物考古的商代遗址。这为完善该地区商代考古学文化序列和编年增添了新的资料，也为邢台地区乃至冀中南地区商代聚落结构、商文化区域特点、生业经济等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实证资料（《河北柏乡县赵村遗址2015年发掘简报》，《东方考古》第16集，科学出版社）。此外，2015~2016年在青海民和喇家遗址东南部VIII3区发现了辛店文化居址类遗存，说明喇家遗址存在辛店文化且多集中分布于遗址东南部，丰富了喇家遗址的文化内涵（《青海民和县喇家遗址2015~2016年辛店文化遗存发掘简报》，《考古》第6期）。

在新资料公布的基础上，对区域文化格局也作了一定探讨，多聚焦于中原、长江中下游地区，东方有所涉及，西北、西南地区所受关注相对较少。

河北地区，刘家河商墓是京津地区高等级贵族墓，袁广阔通过出土青铜器的对比，认为刘家河商墓的年代处于郑州白家庄期和殷墟一期之间，很可能是祖乙迁邢后在此分封的子姓燕国的高等级贵族墓（《对北京平谷刘家河商墓的几点认识》，《中国文物报》2019年11月29日）。王祁、史云征分析了河北邢台赵村遗址出土的商代植物遗存，显示该遗存是典型的旱作农业。尽管仅出土1粒水稻遗存，但据此推测商代水稻遗存的北界可能至少达邢台一带（《河北邢台赵村遗址出土商代植物遗存研究》，《华夏考古》第1期）。王红英等对2015年河北邢台赵村遗址出土动物骨骼进行鉴定分析，发现主要动物种属黄牛、羊、猪、狗鹿、狗獾等。此处先民主要通过家养动物（以牛和猪为主）来获取肉食，有少量的野生动物资源。猪在该遗址的祭祀礼仪中占有重要地位（《河北邢台赵村遗址动物遗存鉴定报告》，《东方考古》第16集，科学出版社）。李宏飞根据河北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居址与墓葬所出的陶容器和铜容器，认为该遗址的年代为二里岗上层时期至殷墟文化第二期，并依据居址与墓葬集中分布的特征进而认为“居葬合一”的遗迹分布形态是殷商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藁城台西商代遗址再分析——兼论商文化“居葬合一”的特质因素》，《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7期）。

关中地区，李宏飞对老牛坡86Ⅲ1区墓地进行分析，解读商文化进入关中地区的地方化过程，揭示由商文化系统向周文化系统转变的时间节点不会晚于殷墟文化三、四期之际（《论老牛坡86Ⅲ1区墓地》，《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

本年度对于西北地区商时期早期青铜文化遗存的研究较少，有对辛店文化、礼州晚段



遗存的讨论。任瑞波将辛店文化划分为四期六段，认为山家头类型不宜纳入辛店文化的范畴，山家头文化的年代下限应不晚于辛店文化早期。辛店文化的年代上限可早达公元前15世纪中叶，下限可能在公元前9世纪或稍晚（《论辛店文化的分期与年代》，《考古学报》第4期）。杜战伟、李奎通过与齐家文化的对比研究，推定礼州晚段遗存的年代应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下限可能进入晚商，认为该文化类型与齐家文化向安宁河流域传播有关（《礼州晚段遗存相关问题研究》，《江汉考古》第4期）。

山东地区，商代考古研究见有进展。陈絜从小屯M18所出朱书玉戈切入分析商人东进鲁东南地区的相关问题，认为该墓所出青铜礼器及朱书玉戈多为东土族群之物，墓主应是武丁早夭之子“子渔”（《小屯M18所出朱书玉戈与商人东进交通线》，《故宫博物院院刊》第3期）。陈絜还对晚商戊甬鼎铭文涉及的地名、族名进行考证，认为宜位于山东莱芜境内，省与宜相邻，西位于泰山南麓，甬可能也属东土（《戊甬鼎铭中的地理问题及其意义》，《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9期）。燕生东结合卜辞和金文，从商王朝晚期对东方地区的经略入手，推测夷方地望应该在晚商文化会泉庄与芝水二期等类型分布范围内（《从商王朝晚期对东方地区的经略看夷方地望》，《江汉考古》第4期）。燕生东并于《海岱考古与早期文明》（商务印书馆）一书中，较系统地分析了海岱地区史前至商时期文化发展情况。

长江中下游地区，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区域文化互动与文化格局方面的探讨。孙卓讨论了商时期中原文化对江汉地区东、西部影响的历程，从各时期遗存的年代、分布及文化面貌观察，提出商文化对东部是逐渐消退，而对西部则为直接撤离，体现了中原文化在江汉地区不同的进退策略（《商时期中原文化在江汉地区的影响历程》，《江汉考古》第3期）。此外，孙卓《南土经略的转折：商时期中原文化势力从南方的消退》（科学出版社）一书系统地梳理了长江、淮河流域商时期的考古材料，就二里岗至殷墟一期中原文化对南方地区的影响历程作了较深入探讨。福建苦寨坑窑是烧制原始瓷的重要窑址，但缺乏完整器为其年代的确定带来困难。付琳以虎林山墓地出土陶尊等同类器物分析，认为苦寨坑窑的年代应为早商、晚商之际（《从虎林山墓地出土陶尊看苦寨坑窑址的年代》，《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王昌月指出赣江流域商时期存在着东西二元对立的文化格局。其东部地区分布着万年文化，西部地区则历经了由石灰山文化至吴城文化的文化中心时空更迭，认为这一文化格局的形成可能与资源相关（《赣江流域商时期文化格局变迁》，《江汉考古》第2期）。李岩对广州村头遗址分期进行讨论，将其分为五期，一至四期年代在距今3800年左右至中商时期，第五期已进入晚商阶段（《村头遗址分期及相关认识》，《南方文物》第4期）。

西南地区，三星堆遗址仍是热点话题。于孟洲、吴超明提出，十二桥早期遗存是以金沙遗址精品房出土的商代遗存为代表，称之为十二桥精品房阶段遗存。将三星堆一号器物坑出土陶器归入十二桥文化精品房阶段，两者应属于不同考古学文化。同时，梳理了成都平原早期青铜文化的发展，认为其进入十二桥文化精品房阶段后，三星堆聚落走向衰落，金沙聚落骤然兴起（《十二桥文化早期遗存初论》，《考古学报》第2期）。施劲松从长时段的视角，分析了成都平原宝墩文化时期、三星堆文化时期、十二桥文化时期和春秋战国时期墓葬的特点，由此对先秦时期成都平原文化和社会的特征、演进和变革进行考察（《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墓葬、文化与社会》，《考古》第4期）。他还对成都平原先秦时期房址的特点和变化进行梳理和讨论，将其分为有墙基的木骨泥墙房址、多有柱网结构的大

型单体房址、小型干栏式建筑三类。三类房址在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时期同时存在。而十二桥遗址的木构建筑可能是濒河而建的某类特殊建筑（《成都平原先秦时期的房址——兼谈十二桥遗址的木构建筑》，《南方文物》第5期）。

另有学者对商代的粮仓、祭祀遗存、手工业制作等方面进行研究。曹大志以商代的甲骨、金文材料为基础，结合新石器时代至秦汉时期的考古发掘和图像材料，将商代粮仓按形式分为画、高、京（《论商代的粮储设施——画、高、京》，《古代文明》第1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谢肃《商代祭祀遗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从商文化祭祀遗存与周围遗迹现象的关系入手，对祭祀遗存进行分类，并探讨了祭品制度与祭祀方法等问题。岳占伟和荆志淳以殷墟制陶和熔铜实验为例，探讨了实验考古的过程及其重要性（《实验考古是探索古代技术的重要方法——以殷墟制陶和熔铜实验为例》，《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李楠对商周时期不同死亡年龄墓主的埋葬情况进行梳理，认为当时的成年年龄应在12岁左右，并对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在墓葬上的主要差异进行总结（《商周时期成年年龄初探》，《古代文明》第1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此可看作近来墓葬研究中一个新的视角。

本年度也罕见对先周文化的探讨，相关研究持续低迷。

四 西周

2019年度西周考古发现与研究仍集中于丰镐、周原都邑类遗址，而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和绛县横水墓地也颇引人瞩目。随着新材料的报道或是对已有材料的重新梳理，霸、圃、虢、燕、应、楚、密、邢等诸侯国及周边地区受到一定程度的关注。

对西周王朝中心地区遗存的研究未由于新刊布材料的相对减少而影响到讨论的热度，涉及内容较丰富，显示出一定多样化研究趋势。对水系遗存的考察成为近年来研究的一个热点。王迪、魏泽华讨论了丰京遗址近些年新发现的相关水系遗存的年代与作用，认为古河道的始建年代应在西周初期和晚期之间，古河道既构成丰京南部的屏障，又为生产生活提供稳定水源（《再议丰京遗址新发现的水系遗存》，《中原文物》第3期）。付仲杨结合丰京遗址水系遗存和其他遗存的分布状况，对丰京遗址聚落布局及其演变特征进行解析和总结。他认为文王营建的丰京可能在鄠邬岭以南，曹寨南至大原村西古河道以北，沔河以西，灵沼河以东区域。西周晚期河道被废弃，丰京遗址逐渐向南扩展，由此他指出丰京可能未建有城垣（《丰京遗址水系与聚落布局》，《江汉考古》第5期）。付仲杨、王迪和徐良高对丰镐遗址近年考古工作进行了总结并提出相应思考（《丰镐遗址近年考古工作收获与思考》，《三代考古（八）》）。王迪分析了西周时期气候变化与丰京聚落布局的关系，认为前者直接影响了后者的演变（《试析西周时期气候变迁与丰京聚落布局演变的关系》，《三代考古（八）》）。周羿辰、凌雪等采用现代分析手段，从微观结构、化学成分、吸水率和显气孔率进行分析，得出其原始瓷的制作尚处于初级水平（《沔西遗址出土西周原始瓷胎釉特征的初步研究》，《文博》第2期）。

周原遗址的研究仍是热点，相关发掘资料得以公布，研究持续推进。贺家村北发掘了4座墓葬和12座灰坑，墓葬年代集中于西周晚期晚段，应为殷遗民之墓（《2015年周原遗址贺家北（IIC3区）墓葬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5期）。赵庆森结合铜器铭文、陶文资料及周原遗址相关资料，认为西周金文中的“周”地是指西土岐周，其核心区域



就在周原遗址。西周中期以降，周原遗址的聚落发展与金文所见岐周的政治地位有所提升有关，这种变化很可能与同时期王朝都城的回归有关（《再论西周时期的“周”地及相关问题》，《三代考古（八）》）。王鹏认为，周原青铜轮牙马车很有可能是继承了殷商的传统，间接地可能与萨坦墓地出土的彼特罗夫卡文化马车有关（《周原遗址青铜轮牙马车与东西文化交流》，《考古》第2期）。张煜珽分析周原西周水资源的利用，认为在西周早中之际兴建的引、蓄、供水系统工程，使周人基本摆脱了对河道等自然水源的依赖（《周原西周水资源利用的初步认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期）。属大周原区域，的岐山孔头沟遗址铸铜作坊的资料得以公布。作坊从西周中期持续到西周晚期，发现陶窑、陶范等大量铸铜相关遗存和以陶器为主的非铸铜遗物（《陕西岐山孔头沟遗址铸铜作坊发掘简报》，《南方文物》第3期）。辛怡华对孔头沟聚落遗址的性质重新认识，提出其所在地应是太公次子的封地，是太公家族的采邑（《岐山孔头沟遗址族属及相关问题》，《西部考古》第17辑，科学出版社）。

西周时期关中地区马鞍形饰随葬品以往较少受到关注。马赛、张锦华对其基本形制、材质和用途进行讨论，认为此类马鞍形饰具有较浓郁的商文化特色，可能属于坠饰。此类器物在关中地区出现，很可能意味着殷遗民在此地的出现，这或对商末周初墓葬的具体年代判断有所帮助（《关中地区出土马鞍形饰初论》，《文物》第12期）。

关中腹地以外地区的研究，以墓葬分析为重点。其中科技手段研究所占的比重有所增加。山西翼城大河口墓地的发掘，引发了对霸国的深入研究。裘锡奎讨论了该墓地 M2002 出土的盘盃铭文（《大河口西周墓地 2002 号墓出土盘盃铭文解释》，《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第八辑，上海古籍出版社）。张程昊对 M1017、M1 出土的有铭铜器进行分析（《霸国墓地出土铜器零释》，《中原文物》第2期）。朱磊等人对 M5010、M6043 实验室考古工作进行了简要介绍（《山西翼城大河口 M5010、M6043 实验室考古简报》，《江汉考古》第2期）。刘勇等人基于对 M5010 出土的铜马胄饰片的工艺和材质分析，指出商周时期锻制工艺在中原地区的发展与金器、车马装饰品的出现和流行可能存在一定联系（《大河口西周墓地 M5010 出土锻造铜饰的技术特征及其相关问题》，《江汉考古》第2期）。同时，刘勇、王颖竹等人对 M6043 出土的珠饰样品进行了显微结构观察和化学成分分析，认为成型工艺是在木质芯撑上直接塑形，皆采用了风干施釉工艺，釉砂皆为中国本土自制，此为研究西周时期釉砂制作技术体系提供了新材料（《大河口西周墓地 M6043 出土釉砂珠饰的科学成分研究》，《考古与文物》第2期）。

山西地区邰国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也引起重视。已经公布的绛县横水西周大型墓 M2158，其年代在西周中期偏早，表现出浓厚的商、周文化和自身文化兼具的特征。发掘者认为该墓墓主可能是西周王朝分封邰国的国君邰伯（《山西绛县横水西周墓地 M2158 发掘简报》，《考古》第1期）。

对于虢国的研究，由三门峡市虢国博物馆主编的《周风虢韵：虢国历史文化陈列》（科学出版社）充分展示了 20 世纪 90 年代虢国墓地出土文物。路懿菡通过分析清华简《系年》中的相关记载，认为西虢东迁的时间应远早于周平王东迁（《清华简〈系年〉与“西虢东迁”相关问题考论》，《文博》第6期）。唐英杰和李发对三门峡虢国墓 M2009 墓主身份进行考证，认为其为两周之交扶植周携王的虢公翰（《三门峡虢国墓 M2009 墓主虢仲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0期）。李清丽等人利用能谱分析仪和激光共焦显微拉曼光谱仪，发现虢国墓地 M2009 出土麻织品上红色染料是由赭石染色的结果（《虢国墓

地 M2009 出土麻织品上红色染料的鉴定》，《文物考古与考古科学》第 31 卷第 3 期）。

江汉地区的相关考古发现与研究聚焦于楚文化。保康穆林头遗址发现周代早期遗存，可能与文献记载的楚兴国之地——荆山中相对应，对早期楚文化探索意义非凡（《湖北保康穆林头遗址 2017 年第一次发掘》，《江汉考古》第 1 期）。杨权喜介绍了在沮河上游考古调查发现的新石器至战国的遗址，主张楚丹阳“远安说”（《沮河上游两岸的考古发现与楚丹阳“远安说”》，《荆楚文物》第 4 辑，科学出版社）。

还有其他一些封国的研究，主要围绕随葬品分析、国族辨识和发展变迁而进行。

杜金鹏指出琉璃河西周燕国墓葬随葬玉器主要是装饰品，罕见玉礼器，并且随葬玉器的多寡与墓主身份地位无关。此与其他西周封国的墓葬情况大相径庭（《北京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出土宝玉石器研究》，《东方考古》第 16 集，科学出版社）。冉宏林通过分析北京琉璃河西周墓葬，提出西周时期随葬陶簋的墓葬其族属即为殷遗民，并认为陶器组合应作为族属研究一个方面加以考察（《西周墓葬的陶簋与殷遗民——以琉璃河墓葬为主》，《四川文物》第 1 期）。申红宝分析认为北京昌平区白浮西周墓是商周时期“其”国首领或贵族墓葬（《略论北京昌平区白浮墓的族属问题》，《北方文物》第 2 期）。辛怡华根据对“密叔”铭文青铜器的考证，认为密叔属于姬姓公族，地位身份相当于公一级。密国与密须不同，密国的建立是用来拱卫岐周和镐京安全的，至恭王时被灭，周王朝在该地区的防御布局被破坏（《密叔、密国及相关问题》，《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杨文山根据有关文献和青铜器铭文记载，认为西周邢国有两个封地，一是邢丘，一是邢台。对以为西周邢国只有一次封命和一个封地的观点提出质疑（《西周邢国两次封命与两个封地考辩——兼回庞小霞对邢国二次迁封的批驳》，《文物春秋》第 2 期）。张丹依据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及其他来源的带铭铜器材料，分析了西周早期到春秋早期应国与王畿地区和南土境内的诸侯国的联姻关系，认为此与当时的政治地理结构以及周王朝经略南土的举措有关（《应国滕器及联姻关系研究》，《中原文物》第 6 期）。

此外，张家强等提出郑州娘娘寨遗址墓葬的年代为西周晚期至两周之际。并通过对其墓葬形态、随葬品等多方面的因素分析，认为城内墓葬族属为殷遗民，城外墓葬族属为周系族群（《论郑州娘娘寨遗址墓葬特征与族属》，《中原文物》第 6 期）。

陕甘地区，陕北的铜川耀州区石柱镇活龙村发掘了一处西周早期周人墓地，共 33 座中小型墓葬。随葬器物以鬲罐组合为主，墓葬中有毁兵而无腰坑和殉狗等特征可以确定其为典型的周人墓地，为研究西周早期关中北部周人的分布提供了新线索（《陕西铜川耀州区石柱活龙村西周墓地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 6 期）。孙战伟分析甘谷毛家坪 B 组遗存的来源，将器物分为两类：甲类遗存以双鬲、双耳鬲为代表，乙类遗存以双耳罐、单耳罐、双鬲罐、高领罐等为典型器，据此提出二者主要来源分别为李家崖文化和寺洼文化（《毛家坪 B 组遗存再认识》，《考古与文物》第 2 期）。

山东地区，曲阜果庄遗址公布了少量西周中期遗存（《曲阜果庄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十二辑，科学出版社）。曹斌分析了鲁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的多种文化因素，认为周文化因素逐渐取代商文化因素居主导地位，而本地文化因素始终占一定比重（《鲁北地区西周时期遗存的文化因素分析》，《华夏考古》第 6 期）。陈絮通过分析陕西扶风所出作册旂组器并结合晚商卜辞，认为望、相二地或属东土地名，大致皆坐落于鲁中地区。昭王将望地赏赐给相侯是为安抚东土从而更好地开拓南方（《作册旂组器中的地理问题与昭王边域经营策略》，《南方文物》第 3 期）。



东南地区的考古发现与关注重点仍不脱离土墩墓。江苏常州牯牛墩西周晚期土墩墓的发掘为土墩墓营建、埋葬习俗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江苏金坛茅东村牯牛墩土墩墓发掘报告》，《东南文化》第1期）。王昌月从原始瓷豆的型式分析入手，认为安徽屯溪土墩墓群年代为西周早期偏晚至两周之际，出土陶器以本地制造为主，部分直接来自中原，于是提出在其所处的休屯盆地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安徽屯溪土墩墓与休屯盆地区域文明研究》，《东南文化》第3期）。付琳对江南地区周代墓葬进行整体分期与分区，将其分为五期、九区，并对各区族属做出了推定（《江南地区周代墓葬的分期分区及相关问题》，《考古学报》第3期）。

杨文昊对东北地区两周时期西团山文化的毁器葬俗进行探讨，他认为毁器现象应有其涵义，推断此葬俗的功能有三：一是体现了生者矛盾心理，二是可能起到明器的作用，三是反映了器物改造习惯（《西团山文化毁器葬俗研究》，《文博》第3期）。

五 东周

2019年度的东周考古发现主要集中于墓葬材料，表明东周大墓和墓地的揭露仍是目前田野工作的重点，其他方面的新发现相对较少。发现与研究主要涉及三晋两周、秦戎文化、楚文化、巴蜀地区等。

（一）三晋两周及邻近地区

这一区域墓葬发掘取得了丰硕收获。山西地区公布的材料基本与晋国有关。陶寺北两周墓地2018年发掘春秋时期竖穴土坑墓109座、祭祀坑31个，贵族墓葬特征体现了周人的传统，应是晋国的一处“邦墓”（《2018年陶寺北两周墓地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19年3月9日）。山西闻喜邱家庄发掘了一座大型墓葬，年代大体为战国早期，墓主应为晋国高级贵族，是山西发掘的规模最大的东周墓葬之一（《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山西省临汾市隰县瓦窑坡墓地铜器墓M23的资料被公布，年代大体相当于春秋晚期，其出土的青铜器与周边其他晋系墓葬出土的同类器接近，为晋国青铜器的生产流通提供了新资料（《山西隰县瓦窑坡墓地春秋墓葬M23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1期）。2018年安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汤阴县姜河墓地发掘东周墓葬85座，马坑1座。其中M1的规格最高，出土了迄今为止唯一一把春秋晚期吴王诸樊在位期间铸造的带铭自用剑（《河南汤阴姜河东周墓地M1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4期）。同年，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义马市文物保护管理所对义马上石河墓地进行考古发掘，所报道的3座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属于春秋早中期中型贵族墓葬，为研究豫西地区春秋时期的葬俗、葬制提供了重要材料（《河南义马上石河春秋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4期）。针对新发现的吴王诸樊剑，曹锦炎认为这是诸樊继位吴王后的元年铸造的自用之剑（《河南汤阴新发现吴王诸樊剑考》，《中原文物》第6期）。郑立超对义马上石河墓地M35出土的铜鍪进行研究，认为M35墓主属于下士一级的低级贵族，铜鍪可能是墓主生前为虢国国君征战所获的战利品（《河南义马上石河春秋墓地M35出土铜鍪及相关问题》，《中原文物》第4期）。

王震从铜器墓与陶器墓展开分析，认为琉璃阁墓地的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早段，应为晋卿魏氏的一处家族墓地，而其周边临近区域应是魏国贵族乃至魏王的集中埋葬

地（《辉县琉璃阁墓地的年代及性质新论》，《考古》第11期）。河北隆尧柏人城遗址为东周晋、赵城址，是仅次于邯郸赵王城的第二大城市（《河北隆尧柏人城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9年9月27日）。隆尧乡观遗址发掘12座战国中晚期墓葬，存在有赵和中山两种文化因素，是其所处两国交界地带，人群交流频繁的体现（《河北隆尧乡观遗址I区战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春秋》第4期）。杜博瑞通过对东周赵国青铜礼器组合形式、器物摆放规则等器用制度分析，提出自战国中晚期中段开始，鼎、豆、壶的器物组合形式开始崩溃，体现了这一时期礼制缺失与权力意识更迭的社会现象（《东周赵国青铜礼器组合探析》，《文博》第4期）。

郑韩故城的研究也引起了关注。陈博对郑韩故城中行马坑遗址为祭祀坑提出质疑。通过考察马坑及马匹特征，认为中行马坑中的马匹应为郑国公室所蓄养的种马，此马坑因偶发事件在较短时间内形成（《郑韩故城中行遗址马坑性质刍议》，《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4期）。樊温泉综合梳理近年来郑韩故城最新考古发掘材料，对各类遗存进行了简要分析，重点揭示各时期墓葬特点及其反映的文化内涵（《郑韩故城近年来重要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华夏考古》第4期）。通过对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的发掘，发现了道路、车辙、水渠、渠门、瓮城等遗迹，为都城形制、古代交通、军事防御体系等方面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河南新郑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春秋战国时期遗存发掘简报》，《华夏考古》第1期）。

同时，徐昭峰《东周王城研究》（科学出版社）一书对东周王城的城墙与城门、宫殿建筑、手工业作坊、祭祀遗存、墓葬等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张亮对洛阳地区战国中晚期陶器墓进行分群研究，依据陶礼器组别和墓葬形制将其分为代表本地周文化、外来文化、具有混合文化因素的三群，揭示各时期各群间的关系（《洛阳地区战国中晚期陶器墓的分群研究》，《考古》第9期）。河南荥阳官庄遗址发现有春秋早中期手工业作坊遗存，以铸铜为主，还有制陶和制骨遗存，作坊区发现有工匠墓葬（《河南荥阳官庄遗址发现两周及汉代手工业作坊遗存》，《中国文物报》2019年2月22日）。

陕西澄城的刘家洼芮国遗址是近年来东周考古关注的重点之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遗址东I区墓地发掘70余座墓葬，其中M6、M49两座保存较好的中型贵族墓发掘资料见于报道，其年代为春秋早期偏晚阶段，芮国墓葬又添新资料（《陕西澄城刘家洼芮国遗址东I区墓地M6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2期；《陕西澄城刘家洼春秋芮国遗址东I区墓地M49发掘简报》，《文物》第7期）。随着刘家洼发掘的进行，其聚落布局逐渐明朗。根据出土与“芮”有关的铭文，其应是春秋早中期芮国的都邑遗址（《陕西澄城刘家洼东周芮国遗址》，《考古》第7期）。

以区域及文化谱系概念命题的研究有成果问世。李晓健对太行山东麓地区东周陶鬲谱系进行研究，将其分成二期六段，空间上划分为北、中、南三区。认为东周陶鬲的分布变迁，与这一时期该地区区域内封国的兴衰、考古学文化的变迁存在密切的关系（《太行山东麓地区东周陶鬲谱系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科学出版社）。

（二）秦戎文化地区

甘肃漳县墩坪墓地抢救性发掘了多座东周墓，主体年代为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从墓葬所体现的文化看，既有秦文化因素又有当地土著文化因素，应与秦人西进有关（《甘肃漳县墩坪墓地2015年发掘简报》，《文物》第3期）。2019年，秦文化的研究并不多。陕



西西安马腾空遗址也发现较为丰富的东周遗存，包括墓葬、房址、灰坑、陶窑等。其中清理了270余座东周时期秦墓，并发现一处藏有3件战国楚式青铜器的窖藏，为秦文化东进提供了资料，也反映了秦、楚文化的交流（《陕西西安马腾空遗址考古发掘获得新成果》，《中国文物报》2019年7月19日）。浙川全岗遗址发现战国晚期至秦代的墓葬，出土遗物以秦文化因素为主，地方特色也较为突出，并吸收了少量楚文化和中原文化因素，是研究战国晚期秦楚关系的重要资料（《河南浙川县全岗遗址战国晚期至秦代墓葬的发掘》，《考古》第11期）。内蒙古准格尔旗福路塔墓地共清理了32座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的秦葬，应与战国晚期秦国势力扩张有关（《内蒙古准格尔旗福路塔战国秦墓地2017年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第6期）。对于战国长城的调查，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的《宁夏早期长城调查报告》（文物出版社）主要公布了对宁夏早期长城遗迹遗物的调查情况，为研究宁夏战国秦长城、秦军事防御体系等问题提供了重要资料。

本年度对戎文化的研究相对较多，使得东周戎人研究保持一定的热度。赵欣欣、杨建华对内蒙古出土北方系青铜服饰品进行分类，认为可分为身体装饰和服装配饰两大类，由于戎人善于骑射，形成了其注重腰部装束的习俗（《东周胡服的考古学考察——以内蒙古出土北方系青铜服饰品为例》，《北方文物》第1期）。郭物认为马家塬墓地中高等级墓葬缺少短剑、管銎啄戈一类的武器，可能与秦国的管控有关，另外，出土车辆、铜壶等器物则反映了这支戎人受到华夏礼制和文化的深刻影响（《马家塬墓地所见秦霸西戎的文化表象及其内因》，《四川文物》第4期）。张寅通过对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遗存的考察及特点分析，发现其与河西走廊东端的沙井文化“三角城类型”较为相似，于是提出“马家塬类型”应来源于沙井文化“三角城类型”（《东周西戎文化马家塬类型来源初探》，《考古与文物》第2期）。张寅分析以寺洼文化和东周西戎文化为代表的西戎族群的两阶段的遗存，认为其生业模式存在着明显不同，反映了其由定居生活向游牧经济转变的过程（《两周时期西戎族群生业模式的转变》，《北方文物》第2期）。《西戎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收录了“西戎文化的发现与研究”学术研讨会的多篇论文，对西戎文化和西戎与周秦互动等方面有了更深的认识。

（三）楚文化地区

东周楚文化考古工作不乏亮眼成果。湖北荆州龙会河北岸战国楚墓出土了大量战国楚简，载有东周时期12位楚王谥号和部分楚国高级军事职官名称，以及周武王、周公旦相关事迹，部分内容不见于典籍，为佐证西周初年史实，研究楚国历史和政治军事思想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2年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枣阳九连墩M1进行了发掘，该墓为战国中期楚国上大夫高级贵族墓，出土遗物丰富，推动了楚墓葬制和楚文化的深入研究（《湖北枣阳九连墩M1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3期）。对湖北宜城楚皇城城址北城墙进行的考古发掘，发现城墙、护城河灰坑等遗迹，城墙存在于战国早期至汉代，应是楚国为防御秦及中原各国而设立的一处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城址（《湖北宜城楚皇城城址北城墙2017年度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5期）。湖北宜昌万福埡遗址向家台、甘家河片区进行发掘，包含沔河、陕南鄂西北、襄宜、随枣走廊等区域文化因素（《湖北宜昌万福埡遗址向家台及甘家河片区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5期）。湖北荆州七星堰墓地和三红双土地墓地均发现了战国时期的楚墓（《荆州七星堰墓地JSQM57发掘简报》《荆州三红双土地墓地发掘简报》，《荆楚文

物》第4辑，科学出版社)。湖南常德汤家大屋遗址亦发现战国中晚期的楚文化遗存(《湖南常德鼎城区汤家大屋遗址考古发掘简报》，《湖南考古辑刊》第14集，岳麓书社)。河南淮阳平粮台战国晚期楚墓M17，出土有大量青铜器、玉器、陶器，对研究楚都陈郢时期楚墓形制有重要意义(《河南淮阳平粮台战国楚墓M17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5期)。南阳夏庄墓地发掘了一处战国早中期高等级贵族墓葬群，主墓中墓主人“不见冢”，可能是“携周典奔楚”的周王室继承人王子朝(《河南南阳发掘东周贵族墓葬群，“王子朝奔楚”千古之谜有望破解》，《新华网》2019年8月28日)。南阳淅川葛家沟战国墓发现秦、楚两种文化类型的墓葬，是战国晚期两国战争的反映(《河南淅川县丹江淹没区葛家沟战国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3期)。南阳淅川裴岭发掘三座战国秦墓，为丹江地区秦楚关系提供新资料(《河南淅川裴岭战国墓M10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4期)。南阳邓州王营村M125战国墓的发掘，出土遗物丰富，以玉器最为精美(《南阳邓州王营M125战国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第5期)。为配合南水北调工程发掘的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的3份简报得以发表，根据墓葬位置关系、随葬器物形制特征及组合关系等判断，M1为鄂侯夫人墓，年代为春秋早期晚段；M7为鄂侯墓，M16为鄂侯夫人墓，墓葬年代为春秋早期中段；M19为鄂侯墓，M20为鄂侯夫人墓，墓葬年代为春秋早期早段(《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19、M20发掘简报》《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7、M16发掘简报》《河南南阳夏饷铺鄂国墓地M1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4期)。

徐良高通过对秦地的楚文化因素分析，发现楚文化在西北方向居守势地位。而从吴越地区的楚文化特点看，呈现一种攻势、主导地位。这一现象与文献所载战国中晚期楚国势力东进西退的史实相符(《考古发现所见楚文化在东南和西北方向的进退》，《三代考古(八)》)。印群对比春秋时期的楚国王室墓地与非王室墓地殉人墓，对楚国殉人墓在葬式、葬具、等级以及殉人性别等方面进行分析(《论春秋时期的楚墓人殉》，《三代考古(八)》)，指出淅川下寺春秋楚王室墓地乙组殉人墓的同椁殉葬等方式，属于楚文化大量吸收周文化因素的一部分(《论淅川下寺楚王室墓地殉人墓的文化因素》，《南方文物》第6期)。肖航通过对楚墓中陶俑葬的梳理，认为其为战国中晚期新出现的一种丧葬习俗，应是受北方俑葬习俗的影响，部分陶俑葬仅有陶制俑头或俑手，应为葬俑的简化形式(《楚墓陶俑葬的初步认识》，《东南文化》第5期)。徐少华认为南阳李八庙一号墓的年代为春秋中期偏晚，鼎铭“番子”体现了其国族成为楚系附庸之后的身份和地位(《河南南阳李八庙一号墓的年代与番子鼎之属性》，《考古》第9期)。肖启荣、黄锦前对河南淅川徐家岭M11出土小口鼎及浴缶的有关资料作了详细介绍，并将其年代定为战国早期前段，认为鼎铭“长瞞之”及仆儿钟铭“余瞞乘儿得吉金罇铝”的“瞞”皆应读作“赖”；“大尹”为官名，初见于出土楚文字资料，可补文献记载之阙(《淅川徐家岭M11出土文字资料及相关问题》，《考古与文物》第4期)。尚如春通过对平顶山应国墓地两座楚系墓葬M10、M301的分析，推定墓的年代为战国早期早段；两座墓墓主是已楚化的应国贵族后裔，即应国墓地中有两类墓葬，其分布范围、葬俗、年代等虽然存在差别，但族属却始终未变(《平顶山应国墓地M10和M301的年代、墓主及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0期)。该结论为考古学文化族属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

一直颇受关注的东周曾国考古又有喜人的发现。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发掘春秋中、晚期2座“甲”字形大墓、3座马坑及52座土坑墓。据铭文知其为春秋中期曾侯宝及其夫人随仲芈加的墓葬，也证明了曾即随。青铜器特征反映出其由宗周文化因素向楚文化因素



的转变（《湖北随州枣树林墓地 2019 年发掘收获》，《江汉考古》第 3 期）。义地岗曾侯求夫妇墓随葬品丰富于同时代楚国墓葬，说明当时曾国的地位至少应与楚国相当（《随州考古再获重大发现：春秋早期曾侯求夫妻墓被成功发掘》，《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第 8 期 转自《新华网》2019 年 8 月 8 日）。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春秋中期曾国铜矿冶炼遗存的发现，有助于曾国青铜器生产、铜矿资源管理等方面的研究（《湖北京山苏家垄遗址 2018 年考古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 6 期）。我国成功追索流失日本的曾伯克父青铜组器，这批春秋早期的青铜组器铸有“曾伯克父甘婁”，于研究曾国宗法世系有重要价值（《中国成功追索流失日本曾伯克父青铜组器》，《中国文物报》2019 年 9 月 13 日）。

关于曾国的相关研究：李零对曾侯乙漆箱二十八宿的文字重新进行了释读和补证（《曾侯乙墓漆箱文字补证》，《江汉考古》第 5 期）。张昌平对曾侯乙一号陪葬坑帷帐进行了复原研究（《曾侯乙墓一号陪葬坑帷帐复原研究》，《考古》第 4 期）。孙卓以曾侯乙墓青铜礼器的组合与分组为例，提出楚系贵族墓葬存在着两种器物组合形式，一种是沿用周制的鼎、簋、鬲组合，一种是春秋早中期后形成的新的器用制度（《楚系高等级贵族墓葬中青铜容礼器的分组问题——以曾侯乙墓为例》，《考古》第 8 期）。鄢国盛指出曾侯乙编钟铭文“君庇淮夷”之“淮夷”应位于淮河上游，年代可追溯至周初成王时期，与铭文中所记载的曾国始封君南公“君庇淮夷”的史实相符（《曾侯乙编钟“君庇淮夷”献疑》，《故宫博物院院刊》第 12 期）。黄锦前、姜维分析了河南新野小西关与湖北枣阳段营春秋墓，认为皆属于春秋早期姬姓曾国墓葬。根据相关铭文记载，推测周初曾国始封地应包括新野一带（《新野小西关与枣阳段营春秋墓的年代、国属及墓主》，《四川文物》第 5 期）。刘松山、章庆通过考察湖南长沙扫把塘一三八号战国墓和湖北枣阳九连墩一号战国墓出土弩的结构特点，认为其属于可拆装便携式弩（《战国可拆装便携式弩小考》，《江汉考古》第 3 期）。徐少华认为京山苏家垄 M85 的年代为春秋中期，根据墓内未见兵器的情况以及铸器铭文推测，墓主人可能为由宋适曾的低等贵族。这对于深入认识春秋中期诸侯国关系和社会变迁具有启示意义（《苏家垄 M85 的年代与文化特征略论》，《江汉考古》第 4 期）。

（四）巴蜀地区

重庆渝北赵家湾墓群 M1 的材料见于报道，年代基本处于战国末期至秦代，楚文化因素明显，也存在巴文化因素（《重庆渝北赵家湾墓群 M1 发掘简报》，《文物》第 6 期）。重庆万州万顺墓群发现战国晚期墓，出土有典型巴文化风格的铜戈（《重庆万州万顺墓群 2018 年度发掘简报》，《北方民族考古》第 8 辑，科学出版社）。四川石渠发现了年代上限大致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岩画，对于四川地区早期岩画研究及其与青海、西藏地区的关系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四川石渠县阿日扎、温波乡岩画调查简报》，《四川文物》第 6 期）。研究方面主要围绕文化面貌与内涵以及文化间关系的揭示、聚落形态研究等展开。洪梅、严志斌对战国罗家坝墓地的巴蜀符号进行整理分析，并与巴人区和蜀人区进行对比，发现罗家坝墓地虽然在地理与文化上属于巴人，但其文化面貌特别是巴蜀符号的组合，却与蜀人区有很明显的相似性，这对于探讨其与四川盆地西部、北部之间的文化联系有重要意义（《宣汉罗家坝墓地出土巴蜀符号探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 4 期）。孙华提出，古蜀成都城市的选址和格局，与金沙村遗址和三星堆城址的格局基本一致，古蜀国迁都不在旧城一带的原因可能与环境变迁有关（《战国时期的成都城——兼谈蜀国的都城规划传

统》，《古代文明》第1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陈小三认为四川牟托一号石棺墓中铜甬和编钟受到了山东南部到皖南地区的影响，可能是当地土著模仿生产之物（《牟托一号石棺墓中铜甬和编钟的文化来源》，《三代考古（八）》）。

（五）燕文化地区

河北涿鹿故城遗址清理了两座编号为M1、M2的战国贵族墓葬（《河北涿鹿故城遗址2号战国墓发掘简报》，《考古》第10期；《河北涿鹿故城遗址M1清理简报》，《文物》第11期）。涿鹿故城（黄帝城）遗址2016年发掘情况得以公布，故城始建年代为战国时期，沿用至汉代（《涿鹿故城遗址2016年度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

张超华从都城的军事防御、周邻的军事防御、自然屏障防御等方面研讨燕下都的军事防御体系，认为其具有方式多样化、体系多层次化、防御重点突出等特点（《论燕下都的军事防御体系》，《文物春秋》第5期）。印群将燕下都战国大墓与齐国战国大墓、中山王墓、辉县固围村魏王室墓对比，发现燕下都战国大墓的埋葬特点与前两处墓葬存在较大差异，而接近固围村魏王室墓，即与三晋文化所属的中原文化相近（《论燕下都战国大墓的埋葬特点——与齐国战国大墓等比较》，《东方考古》第16集，科学出版社）。

（六）齐鲁地区

山东滕州市大韩村东周墓地发掘46座春秋晚期至战国时期的大中型贵族墓和149座战国末期的小型平民墓，其中贵族墓M43随葬4件带有“倪大司马”铭文的铜器，墓地或为倪国贵族家族墓地，对于枣滕地区东周考古学文化的研究颇具价值（《2019中国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山东济南长清仙人台周墓M4资料被公布，墓葬随葬品丰富，属春秋中期邾国高级贵族墓（《山东济南长清仙人台周代墓地M4发掘简报》，《文物》第4期）。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2015年至2018年的相关田野考古材料得以发表，包括城墙和壕沟、宫殿区皇台、贵族墓地、仓储等遗存，对于认识邾国故城历史变迁具有重要价值（《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2015—2018年田野考古的主要收获》，《东南文化》第3期），相关详细资料还见于《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宫殿区南部2016年秋季调查简报》（《东南文化》第3期）、《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2017年发掘简报》（《东南文化》第3期）。刘艳菲、王青、路国权以邾国故城出土陶量为基础探讨其与齐国量制的关系，发现邾国量制与齐国量制非常接近，进而指出齐国量制可能在包括邾、鲁两国在内的山东地区广泛适用（《山东邹城邾国故城遗址新出陶量与量制初论》，《考古》第2期）。

与齐国相关的考古收获：《临淄齐墓（第三集）》（文物出版社）公布了临淄周代齐国故城遗址以南的12座战国时期的大、中型墓葬和2座车马坑资料。2016年于山东淄博褚家墓地抢救发掘的两座“甲”字形夫妻并穴合葬齐国贵族墓，年代为战国早期，出土有独辀马车和陶俑（《山东淄博市临淄区褚家墓地两座战国墓葬的发掘》，《考古》第9期）。

马立志认为周代寻氏铜器铭文中的“寻”指的是文献中记载的周代谭国，并根据铭文推测齐国伐灭之前的寻氏可能是子姓（《论周代的寻氏铜器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7期）。靳健根据山东莒县西大庄墓葬出土铜器的形制、纹饰及组合特征，认为西大庄墓葬年代应为春秋早期，进而分析了西大庄墓葬的文化属性及其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再论莒县西大庄墓葬年代及文化属性》，《考古与文物》第2期）。郭梦对山



东地区东周时期锡衣陶的分布、器物特征、值得关注的现象及其意义等方面做了简要介绍与分析（《山东地区东周时期锡衣陶》，《中国文物报》2019年12月13日）。翟胜利认为春秋战国时期海岱地区的盖豆的渊源，可追至高周时期的簋、敦类盛食器（《海岱地区盖豆类器物的渊源及命名问题辨正》，《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7期）。

（七）东北地区

吉林双辽大金山遗址新发现多处房址、墓葬、灰坑、灰沟等遗迹，出土大量动物骨骼、鱼骨及蚌类、贝类等遗物。年代主要为战国至西汉初，应是季节性渔猎捕捞的临时居住点。该类遗存在以往所见较少，此发现为聚落形态、生业模式等研究开阔了视野（《吉林大金山遗址新发现多处青铜时代渔猎遗迹》，《新华网》2019年12月1日）。

辽宁兴城朱家村发掘一座春秋时期木棺墓，为研究短茎式铜剑文化中的“郑家洼子类型”提供了新资料（《辽宁兴城朱家村春秋木棺墓清理简报》，《文物》第8期）。成璟塘、徐韶钢对郑家洼子类型的文化内涵、年代与性质等进行了分析（《郑家洼子类型小考》，《文物》第8期）。同时他们重新审视双房遗址，从遗迹遗物入手，作了文化因素的深入分析（《双房遗址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林森等人对东辽河流域青铜时代猎头现象进行梳理，并探讨其内涵和来源（《东辽河流域青铜时代猎头习俗初探》，《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

（八）吴越地区

安吉龙山107号古墓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于2019年10月31日在安吉县举行，该墓是龙山越国贵族墓群中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对于越文化的研究可谓意义重大（《安吉龙山107号墓考古发掘成果论证会在安吉举行》，《中国文物报》2019年11月8日）。

（九）其他地区

昆明玉碑地遗址也发现了一批春秋战国时期的遗存，值得关注的是铜矿石、矿渣、红烧土块和陶范的发现（《云南省昆明东川区玉碑地遗址发掘简报》，《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云南金平还发现有春秋战国时期集采掘、冶炼于一体的矿冶遗址群（《云南金平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矿冶遗址群》，《新华网》2020年1月6日）。

李文瑛考察了春秋战国时期塔里木盆地南缘、哈密绿洲和吐鲁番盆地区域的纺织服饰考古资料，探讨其织造技术、文化内涵以及与其他地区纺织服饰文化的交流（《春秋战国时期新疆地区纺织服饰考古研究》，《北方民族考古》第8辑）。王明辉等人考察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出土人骨，认为该墓地人群具有古代欧罗巴和蒙古人种的特征，应与人群的迁移有关（《新疆塔什库尔干吉尔赞喀勒墓地人骨初步研究》，《北方文物》第4期）。王震重新探讨了陕西清涧李家崖东周墓葬的年代等问题，将墓地分为三期，指出李家崖文化面貌复杂，可能与晋国“和戎狄”政策的历史背景有关（《陕西清涧李家崖东周墓葬的年代及相关问题》，《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

六 专题研究

(一) 青铜器研究

青铜器研究历来是三代考古的重点，主要涉及类型学分析与谱系研究、考古学文化研究、墓葬器物组合、铭文释读、音乐考古、制作工艺及综合研究等方面，呈现出多元化的研究倾向。

类型学分析与谱系研究是青铜器研究的主流。张懋镛《中国古代青铜器整理与研究》(科学出版社)以器类、地区或纹饰区分,进行专题研究。向明文对巴蜀式青铜釜甗进行型式划分和分期研究,将其发展过程分为二期8段,涵盖战国早期早段至西汉早期早段,并梳理了各阶段特征(《巴蜀式青铜釜甗的类型、年代与分期研究》,《三代考古(八)》,科学出版社)。张昌平通过比较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凤鸟纹卣,梳理该类卣装饰风格以及细部的演变,以此推断安阳孝民屯铸铜作坊相应陶范的年代属于西周早期(《商周之际的凤鸟纹卣——从孝民屯到石鼓山》,《考古与文物》第4期)。孙机根据文献资料和器形特征,梳理了爵从三足爵、瓚形爵、雀形爵到杯形爵的谱系演变(《说爵》,《文物》第5期)。成璟璐《朝鲜半岛青铜武器》(上海古籍出版社)对朝鲜半岛出土青铜武器进行整理与研究,分析其与中国东北地区古代文化的交流情况,值得关注。谭银萍、崔钧平对西周柳叶形青铜短剑形式演变进行考察(《西周柳叶形青铜短剑研究》,《文博》第6期)。余波梳理了石寨山型铜鼓在云南文山地区的发展(《西南地区青铜器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裴书研《周原青铜礼容器研究》(科学出版社)对周原出土青铜礼容器进行综合分析。胡子尧、井中伟认为陕西淳化黑豆嘴遗址出土半月形有銎钺的产生应受到盘龙城遗址的弧刃翘角铜钺的影响,后者经汉中地区传播到关中一带,同时,前者还吸收了北方青铜器以銎纳钺的方式。(《黑豆嘴半月形有銎钺来源探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期)。

考古学文化及深层内涵的揭示是青铜器研究的深刻指向。薛加友从川渝地区出土的商周铜铃的角度分析巴、蜀文化的差异(《西南地区青铜器研究与保护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沈浩注和王宏对甘肃环县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进行研究,认为这批年代为春秋中期至两汉时期的青铜器,应为义渠戎遗存(《甘肃省环县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草原文物》第1期)。杨欢综合分析四瓣目纹的纹饰种类、时空分布、施用规则、纹饰属性与文化因素,认为这种纹饰主要流行于商末周初,分布地域较广,或可起到一种商文化标识的作用(《商周青铜器四瓣目纹研究》,《考古学报》第1期)。王祁分析了西周铜器尊卣的组合模式及起源,指出尊卣组合的雏形期至少可追溯到殷墟三期,认为具有强烈殷遗民的风格,至西周中期后段及其以后,墓葬中基本不见尊卣配对组合(《商周铜尊卣配对组合研究》,《考古》第3期)。毕经纬提出商周青铜器存在中期质变,不会随着王朝更替而突然变化,而是经过一段时间,至中期形成各朝特征。中期质变论的提出有助于揭示器物的发展规律以及族群问题的研究(《试论商周青铜器的中期质变》,《考古》第9期)。陈晓倩透过物质遗存,揭示青铜器所反映的哲学思想。通过对古代铜鼓和铜提筒装饰内容的探析,认为其体现了“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思想及“辩证统一”的早期哲学思想(《中国南方与东南亚青铜时代青铜器装饰的哲学内蕴初探——以铜鼓与铜提筒为例》,《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第4卷第8期)。青铜器产地的研究仍然受到重视。曹大志对有关青铜



器产地与风格分析的方法论问题作了探讨。他通过个案考察,提出在研究铜器产地时不仅要重视器物出土信息,还应结合考古背景、器物风格(器形、装饰、技术特点)、原料来源等信息(《青铜器产地与风格分析——来自黄土丘陵的三个案例》,《南方文物》第5期)。对于近年追缴的义尊和义方彝,韩炳华以两件器物为研究案例,提出铭文中显示的丙族可能与灵石旌介晚商墓地的丙族有关(《新见义尊与义方彝》,《江汉考古》第4期)。张昌平认为义尊和义方彝铭文中“武王赐义贝”的武王,应当是以谥号追称先王,作器年代在成王时期。其在山西发现应与王季伐燕京之戎有关(《谈新见义尊、义方彝的年代及装饰风格》,《江汉考古》第4期)。

音乐考古方面成果亦不鲜见,器物地域性特征受到较多关注。陈艳《春秋许公墓青铜编钟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对2002年发掘的许公墓出土甬钟、纽钟、鎛钟等三十余件乐器进行研究。隋郁《两周越地青铜编钟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结合定量分析的方法从编钟的形制、音乐性能、音响性能及存在状态四个方面分析了两周时期越地青铜编钟的乐器性能和地域性特点。马国伟《先秦吴越音乐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一书,从吴越音乐的考古发现出发,对吴越音乐文化的发展演变及文化交流作了较全面的探讨研究。

青铜器制作工艺方面的研究,成果不可谓不多。袁艳玲《楚系青铜礼器的生产与流通》(科学出版社)从楚系青铜礼器的类型学划分、组合形式、铸造工艺等方面分析,揭示楚系青铜礼器的生产、流通体系等问题。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香港承真楼主编《商周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科学出版社),收录2016年“商周青铜器暨铸造工艺研究研讨会”参会学者论文共13篇,内容主要围绕商周时期青铜器的铸造工艺展开研讨。苏荣誉《中国青铜器技术与艺术(丁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收录了作者对青铜器铸造工艺研究的最新成果,包括宏观层面、区域性青铜器铸造工艺与特殊器物工艺和风格等研究内容。宫本一夫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礼容器的范铸工艺观察,发现该遗址有二里头文化时期的双外范和二里岗文化时期的三外范,进而得出商人占领二里头遗址并用之为其制作青铜礼容器,反映出商王朝建立后对二里头遗址的统治理念以及经济政策(《二里头遗址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过渡期的青铜器生产》,《南方文物》第2期)。苏荣誉等人从陕西淳化黑豆嘴墓葬所出一件青铜壶的技术和风格考察入手,提出扉棱分铸法源自南方,推测武丁时期曾将南方的工匠迁至殷墟铸器(《淳化黑豆嘴出土的青铜壶研究》,《文博》第1期)。刘煜《殷墟出土青铜礼器铸造工艺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对殷墟青铜礼器的铸造工艺、技术来源及演进等问题进行探讨,复原殷墟青铜礼器铸造的工艺流程,推动了殷墟青铜器技术研究的深入。岳占伟等依据殷墟出土实物,从器表范线、圈足镂空等诸多方面,对商代扁体铜卣的铸造工艺作了全面阐述(《商代扁体铜卣的铸造工艺研究》,《南方文物》第5期)。郁永彬等人通过合金工艺、微量元素、铅同位素等方面分析,提出叶家山铜器与王畿地区及其他诸侯国铜器合金均为铜锡铅系统,进而认为西周早期周王室对青铜物料资源进行集中管控与配置(《试析西周早期社会青铜工业生产机制——以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出土铜器为中心》,《文物》第5期)。刘百舸和胡刚对红铜铸镶青铜器的几个技术和艺术问题探析(《红铜铸镶青铜器的几个技术和艺术问题探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10期)。张吉通过对提链器的观察研究,发现春秋中期至战国晚期各地区提链壶的结链方式与形制快速变化,但齐地提链壶自春秋晚期至战国中期固定采用一顺多反的链序,认为这与齐国中心地区特定器类的标准化生产有关

(《试论东周齐地提链壶的结链方式》，《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7期)。林思雨关注商代青铜容器分范技术研究，对有关研究方式转变、模上施纹与范上施纹、垂直分范与水平分范的研究成果进行梳理，重点分析孝民屯遗址发现后的新变化，并对相关研究提出展望(《影响商代青铜容器分范技术研究的三个问题》，《南方文物》第5期)。

以科技检测与分析的方法来探讨青铜器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等方面内容见如：苏贝·乃比等人通过对哈密柳树沟墓地青铜器的科技检测，认为其无论是器形、工艺、成分皆与新疆东天山地区铜器较为相似。矿料来源与新疆西部伊犁州、甘肃西部地区铜矿联系密切(《哈密柳树沟墓地出土青铜器科技分析》，《西域研究》第4期)。马仁杰等人对宜昌万福垭遗址青铜器的金相组织和合金成分进行检测分析，显示其制作工艺与中原地区合金技术传统有较大差异(《宜昌万福垭遗址青铜器的科技分析及相关考古学问题》，《江汉考古》第5期)。张吉等人对钟祥黄土坡墓地出土春秋青铜器的铅同位素比值和成分进行分析，发现其与同期江淮地区青铜器较为相似，是楚系青铜器较为一致的生产管理之体现(《钟祥黄土坡墓地出土春秋青铜器的检测分析及相关问题研究》，《南方文物》第3期)。王颖琛等人就合金成分、金相和铅同位素比值初步分析了宁波镇海鱼山遗址出土铜器，其与临近的浙江黄沿铅矿联系较小，但与中原及江汉等地区有较多的共性，反映了该地区复杂的生产、流通关系(《宁波镇海鱼山遗址出土铜器的初步科学分析》，《南方文物》第3期)。张吉和梁超等人对襄阳余岗墓地出土的部分青铜容器进行金相分析与成分测定，发现多数为范铸而成，三件为锻制成形。这一发现在青铜器制作工艺研究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襄阳余岗墓地出土青铜容器的金相及成分分析》，《江汉考古》第3期)。郭建波和谢振斌从三星堆青铜器矿源、产地、化学成分、制作工艺以及科学保护修复等五个方面，对以往三星堆青铜器的科技分析成果进行归纳梳理(《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科技研究综述》，《中国文物报》2019年11月19日)。黎海超等人对金沙遗址“祭祀区”铜器进行微量元素分组等研究，认为成都平原的铜器生产较为复杂，在早商时期可能已经开始独立的铜器生产活动，且已经对具有本地特征的一些原料有所利用。金沙“祭祀区”铜器所用的铜料、铅料可能有不同来源(《金沙遗址“祭祀区”出土铜器的生产问题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25辑)。相关研究还有张昌平《从曾仲旂父方壶看青铜礼器的制作理念》(《文物》第11期)。

青铜器综合研究方面的专著成果颇多，关注者众。陈梦家《中国铜器综述》(中华书局)和《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订补本)》(中华书局)的出版，对青铜器以及中国青铜器研究史的阐述有着重要学术价值。日本学者林巳奈夫的《殷周青铜器综览：殷周时代青铜器纹饰之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对商代至春秋早期的青铜器纹饰进行较为深入的分析。《罗越与中国青铜器研究：艺术史中的风格与分类》(浙江大学出版社)一书有助于了解学者罗越和高本汉对青铜器研究的方法及理念。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为商周青铜器铭文和图像的检索提供了便利。分地域对青铜器进行整理和研究的著作也较丰富，包括秦岭南北(成都博物馆：《青铜为记：商周时期秦岭南北的文化交流》，四川美术出版社)；山西地区(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编，李夏廷著：《山右吉金：山西商周青铜器纵览》，故宫出版社)；内蒙古地区(杨建华、赵欣欣：《内蒙古东周北方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海岱地区(毕经纬：《问道于器：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等。



（二）玉石器研究

根据玉石器的形制、纹饰演变等内容，揭示玉石器蕴含的深层内涵是其研究的主要趋势。王青《远方图物：早期中国神灵考古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以考古出土的早期玉器和镶嵌铜牌饰为研究对象，结合相关文献记载，探讨了早期中国的神灵崇拜。朱乃诚认为夏商时期玉虎来源于凌家滩文化玉虎，至商代晚期一部分演化为玉龙，另一部分也是西周玉虎的来源（《夏商时期玉虎的渊源与流变》，《中原文物》第2期）。蔡青通过对先秦玉质下颌托材料的梳理，认为中原地区玉质下颌托是因与西来文化的交流而产生，其应与萨满教思想有关（《先秦时期的玉质下颌托》，《文博》第3期）。左骏讨论了古代的射箭活动向“射”的礼制行为转变，伴随的是玉质射护具的产生（《决拾既饮——中国玉质射护具的流与变》，《古代文明》第13卷，上海古籍出版社）。唐锦琼梳理了先秦时期水晶制品及其使用历程（《先秦时期水晶制品初探》，《东南文化》第5期）。张绪球分析了湖北地区战国时期玉器的分期、特征等问题（《湖北地区出土战国时期的玉器概论》，《荆楚文物》第4辑，科学出版社）。谢春明和陈程梳理了战国秦汉玉器中柿蒂纹的发展演变，认为柿蒂纹出现于战国早期，流行于战国晚期，汉代柿蒂纹延续战国柿蒂纹样式，均属楚式纹样（《简析战国秦汉玉器中的柿蒂纹》，《荆楚文物》第4辑）。张强禄透过有领璧环在南方的出现与发展考察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即通过夏商礼制文化的南渐，潜移默化地推进岭南“中国化”的进程（《从华南所见有领璧环看夏商礼制南渐》，《古代文明》第13卷）。李零对妇好墓出土的“龙纽石器盖”和九沟西周墓出土的“龙纽玉印”发表新认识，认为可能其为图形印（《妇好墓“龙纽石器盖”、九沟西周墓“龙纽玉印”及其他》，《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第6期）。和非菲通过对比青铜器纹饰和玉器造型，认为陕西澄城九沟墓地出土玉玺印属于图像印，而不是图形文字（《陕西澄城九沟墓地出土玉玺印再析》，《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

也有运用现代技术对玉石器的制作工艺、原料来源等进行分析的研究。杨宽、赵俊杰和何毓灵对殷墟石器在生产技术、遗址功能和性质等方面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进行了阐述（《小议殷墟石器研究》，《文物春秋》第2期）。刘珺等人对新郑西亚斯东周玉器材料属性与加工工艺进行科技分析，提出玉器加工工艺与材质属性、器型之间有一定联系（《新郑西亚斯东周玉器材料属性与加工工艺的科技分析》，《光谱学与光谱分析》第39卷第11期）。北京联合大学考古研究院和广东东莞博物馆课题组采用微痕分析、实验考古的研究方法，分析村头遗址玉石器的片切割工艺，发现存在两种不同的技术传统，为研究商代华南地区各文化间的交流提供了线索（《东莞村头遗址出土玉石器的片切割工艺研究》，《南方文物》第4期）。黄可佳对村头遗址石器的类型、使用痕迹进行观察，分析了石器的使用、废弃及改制模式，认为该遗址属于石器消费型遗址（《东莞村头遗址石器的使用及废弃过程研究》，《南方文物》第4期）。

（三）漆木器与原始瓷研究

漆器方面，刘露对湖北楚国漆器的发现、制作工艺方面做了简要梳理（《湖北楚漆器制作工艺浅述》，《江汉考古》第S1期）。卢一对先秦时期的漆器进行梳理，认为早期铜器形制及装饰风格的重要来源是对漆木器的模仿，至晚期铜器也并未完全取代漆器的礼器功能（《论先秦礼器中的漆器传统》，《古代文明》第13卷）。洪石对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

器的类型、特点、分期和工艺源流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进一步讨论了绿松石原料的来源问题(《先秦两汉嵌绿松石漆器研究》,《考古与文物》第3期)。余静贵《生命与符号:先秦楚漆器的美学研究》(人民出版社)分析楚漆器的形式规律,探究其反映的精神内容,同时探寻楚人的审美意识对漆器艺术的影响。

郑建明通过对西周早期至战国原始瓷的分析,发现春秋中晚期的原始瓷器类呈现出一种明显的衰退现象,认为这与吴文化南下扩张致使越文化向南退缩有直接的关系(《春秋中晚期原始瓷的衰落与吴文化的南下》,《东南文化》第5期)。郎剑锋从临淄齐墓釉陶鬲的发现出发,认为其产生应是受到了吴越地区原始瓷传入的影响(《东周时期吴越地区原始瓷对北方的影响——从山东临淄齐墓出土釉陶鬲谈起》,《江汉考古》第5期)。

(四) 生业研究

从长时段的视角探讨区域生业是近些年所注重的研究方向。通过植物遗存来分析区域农作物发展,以动物骨骼的研究来探究不同类家畜出现时间是生业考古的主要内容。

赵志军、刘昶对二里头遗址出土的炭化植物遗存进行浮选,发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水稻遗存数量超过了北方旱作农业物粟、黍,可能与二里头遗址作为都城收取贡赋的背景有关。而至二里岗晚期,小麦替代了粟、黍,成为主要的北方旱作农作物(《偃师二里头遗址浮选结果的分析 and 讨论》,《农业考古》第6期)。郭荣臻、靳桂云主要通过对麦遗存分布和相关数据分析,探讨了先秦时期麦类作物在中原地区的发展历程,认为麦类作物至迟在龙山时代传入中原地区,二里岗至殷墟时期麦作发展出现转折期,两周时期,持续稳定发展(《中原地区先秦时期麦遗存的考古学研究》,《江汉考古》第3期)。吕鹏、袁靖讨论了黄河上游先秦时期家养动物和农作物的传播、生业方式的转化及其动因等问题(《交流与转化——黄河上游地区先秦时期生业方式初探(下篇)》,《南方文物》第1期)。董宁宁(《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新疆地区的生业研究》,《南方文物》第4期),罗运兵等人(《长江中游地区先秦时期的生业经济》,《南方文物》第4期),潘艳和袁靖(《新石器时代至先秦时期长江下游的生业形态研究(二)》,《南方文物》第1期)分别讨论了新疆地区、长江中游地区和长江下游地区先秦时期的生业经济。

余翀、张海成探讨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岭南、华南地区的家猪饲养业。广西发现距今6000年左右的家猪遗存,至距今4400年,珠江三角洲地区家猪饲养已较为普遍(《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早期岭南地区的家猪饲养业初探》,《南方文物》第4期)。日本学者菊地大树等根据殷墟出土的马骨检测,确定其属于家马;其又根据考古发现新石器时代及商代的马骨材料并结合相关文献记载,认为中国家马的最初出现应该在商代晚期(《中国古代家马再考》,《南方文物》第1期)。尤悦和吴倩则通过分析新石器时代至东汉的驴骨,提出家驴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可早至公元前550年至前250年(《家驴的起源、东传与古代中国的利用》,《北方民族考古》第8辑)。张哲等人讨论了辽西地区新石器至青铜时代文化转向时生业的变化及对动物资源依赖度的影响(《辽西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动物资源依赖度初探》,《边疆考古研究》第26辑)。张敏提出两周时期吴国形成以矿冶业为主的生业形态,而越国主要生业形态为陶瓷业,致使吴越之间形成了特殊的“资源互动”模式(《陶治吴越——简论两周时期吴越的生业形态》,《东南文化》第3期)。



（五）其他方面

三代时期的军事防御体系和交通要道成为新的关注点。徐昭峰和申颖分别讨论了夏、商、西周畿内防御体系的构建，认为夏至早商畿内防御体系主要为天然屏障；晚商至西周时期，在畿外“建侯卫”，以屏藩畿内。此外，夏商西周国家还重视军队建设，以求防御体系的完备（《试论夏商西周畿内防御体系的构建》，《中原文化研究》第4期）。高江涛分析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的三条道路，指出三条要道具有促进区域文化交流、军事发展、盐铜资源运输等重要功用。此为分析文化互动与区域文化格局演变提供了新视角（《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中条涇津道”》，《中原文物》第1期；《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虞坂巛軹道”》，《中原文物》第2期；《洛阳盆地与晋南早期交通道路之“轹关陘道”》，《中原文物》第3期）。此外，程文博对三代盐业考古发表议论，认为珍珠门文化兴起与商王室对海盐重视有关，其衰亡可能与西周王朝转为重视山西池盐有关（《论珍珠门文化兴衰与商周鲁北制盐业的关系》，《中原文物》第3期）。鲁晓珂等人通过锶同位素和微量元素分析，对山西襄汾陶寺等六个遗址出土白陶的原料来源进行考察，为研究黄河流域白陶的产源关系打开思路（《基于锶同位素和微量元素分析的白陶原料来源研究》，《华夏考古》第6期）。